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1月15日第1期 总第147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47 期

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七）

目录

【专 稿】

辛伯仁 也谈北大文革史中的一些片段

——简评章铎、常风之争

【研 究】

古 樟 文革初期的北大

——浅析张承先的《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评 论】

常 风、魏 明 究竟是谁在歪曲历史真相？

——评胡宗式对《北京大学纪事》的指责

【述 往】

俞小平 纪念李其琛

王复兴 北大工军宣队领导下的清理阶级队伍——翦伯赞是怎样自杀的

【资 料】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同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单位的代表座谈时的讲话（1967 年 8 月 10 日晚至 11 日）

【编读往来】

1. 叶宁、顾勉之谈常风之文
2. 张晓良的感想
3. 何蜀指出 146 期重发齐人之文
4. 郑建国谈任国庆的知青一文

【本刊声明】

【专稿】

也谈北大文革史的一些片段

——简评章铎、常风之争

辛伯仁

前言

《记忆》于2015年11月15日第143期刊登了常风先生《应该客观、真实、全面地还原历史和评价人物——评章铎女士的文章〈我所了解的孙蓬一〉》。章铎的这篇文章是于2015年9月15日发表在《记忆》第139期。两篇文章都谈到北京大学文革历史。常文之文的正题“应该客观、真实、全面地还原历史和评价人物”是个非常好的命题。对于我们每一位文革亲历者来说，在回顾并评价文革历史时，都应尽可能努力地去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历史真相及评价历史人物。唯有这样，才能通过众人的努力，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使人们得到有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从而有助于当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运动，是个有多种动因、多个层次、多条线索、多个方面的社会运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而北大文革亲历者们的背景不同、经历不同、视角不同，因此难免对北大文革史的某些片段的回忆有某些不同，这是正常现象。任何个人（包括笔者）都很难洞悉全部历史真相。任何人声称自己已掌握了北大文革史的全部历史真相，掌握了绝对真理，都是不客观也不真实的。每位北大文革亲历者对北大文革史的回忆与反思，都将是十分有益的，每个回忆者都会反映出历史的一些“碎片”，而众多“碎片”的组合，便能较接近历史的真相。

三联书店出版的《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是一本关于文革

运动的回忆文集，书中18位北京四中当年的学生，从不同角度和立场，记述了这场暴风雨中个人的经历。北岛说“有些叙述往往会溢出校园以外，因为暴风雨是没有边界的。”文集的内容从1965年的四中社教说起，包括红卫兵兴起、破四旧、抄家、串连、武斗、复课、读禁书、上山下乡等等。北岛介绍说，他们“力求复原这所百年名校在那个年代中发生的热点事件和自己置身其中的生活场景，即便各有不同的经历和当年的不同立场，但都在努力为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细节。”同样，常风与章铎尽管对北大文革史中的某些片段有不同的记忆与看法，但他们都在努力挖掘历史真相，努力为后人留下北大文革史中的细节，所做的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北岛在《暴风雨的记忆》一书序言中说“记忆往往具有模糊性、选择性及排他性，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所谓‘历史的真实’，或者说，‘历史的真实’存在于不同的记忆的重合、错位与对立中。”笔者发现，北岛说的这种现象，在人们的回忆文章中是种普遍现象。同样，常风与章铎的记忆，都难免对北大文革史的某些片段的回忆有模糊性、选择性及排他性。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所谓“历史的真实”。但文革历史的真实存在于众多文革亲历者不同的记忆的“重合、错位及对立中。”

对于北大文革史，每位亲历北大文革的校友都有权从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及掌握的史料出发，写出自己的回忆，并发表自己的反思与见解。人们应尽量避免从狭隘的立场或当年的派性出发，做无意义的争论。更不要轻易指责他人“误导”历史，把“历史研究引入歧途”。大家尽可以各抒己见，共同探讨。我很欣赏并赞同《记忆》主编启之先生的“宗旨”：

《记忆》是大家的平台，在这里众生平等。只要摆事实，讲道理，都可以发声。是非正邪，自有史家公断。我想补充一点是：历史的真相及其经验与教训，要由后人来评说。当代看不清的历史，隔代或能较易看清楚。我们的责任，应是尽己所能，为后人留下真实历史的“碎片”及亲历者个人的反思、认识。笔者愿与北大校友们共勉，遵照老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先生的这八字校训曾引领了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思想解放与学术繁荣，今天仍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笔者认为：《记忆》推行的言

论自由与“兼容并蓄”的论坛之风，是繁荣史学研究的阳光正道。

笔者作为一名北大文革亲历者（当年的学生），文革中在北大经历了三年又九个月，愿与校友们共同追忆北大文革史的一些片段，也谈谈本人的记忆与反思。

1、关于孙蓬一的性格

章文在“引言”中提到孙蓬一的性格，说“他直爽、热情、有胆有识，我和好多同学都喜欢他。”

常风认为在评论历史人物时，讲人物的品德，意义不大，主要应看其政治行为。对此，笔者与常风有类似看法，笔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主要应看他对社会进步起的作用。品德及性格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准。因为有时好人也会办坏事。而某些奸雄，也可能会对历史前进做出贡献，如曹操。但由于章文是以个人史为中心，记述了孙蓬一长达40多年的个人命运。而性格决定命运。因此了解孙蓬一的性格特点，也有助于理解他多彩而又起伏的人生。章铎所说孙蓬一性格特点，确如其人，但不够完整。例如：“新北大公社”总部成员黄树田大约在1968年2月的一次“公社”内部串联会上，公开批评本派领导孙蓬一“刚愎自用”。在1969年夏季一次全校大会上，8341政委杨德中做报告，孙蓬一闯主席台，对杨讲，他对迟群有意见，对北大运动有意见，对迟群批判自己有意见。杨德中当场批评孙：“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再如聂元梓曾多次对周围的人批评孙蓬一“鲁莽”。

“刚愎自用”、“固执”、“鲁莽”，这些负面的性格特点也是我所了解的孙蓬一的特点。了解孙的这些性格，有助于理解他在文革中的行为。笔者在文革中是“新北大公社”一员，我对孙蓬一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他择善固执，有胆有识，敢于冒巨大风险，反王、关、戚，反谢富治。不喜欢他择恶固执，把“井冈山”群众视为错误路线的“敌人”，把本派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指责为“右倾”，并自以为这是“善”（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固执地反对大联合，甚至指挥武斗。

2、比较常、章二人文章的异与同

常、章对北大文革史的不同看法，主要集中于各自文章的前半部分，是1966年10月至1968年8月这段历史。而1969年3月8341进校之后的历史，在两人各自文章后半部分，看法较为接近。例如，常文确定“孙蓬一不是5.16分子”，推翻了迟群及后来北大党委对孙蓬一的定性及不实之词。而章文则更鲜明地指出“1969年迟群、谢静宜之流进驻北大后，他（指孙蓬一）一直被打成反革命而被长期隔离审查、批判斗争、劳动改造……长达八年之久。”这显然是践踏人权的典型事例。两人均认为8341把孙蓬一打成“5.16反革命分子”是冤案。那么章铎从这点出发，对孙表示同情，应是情理中事，无可厚非。

从1967年1月至9月这段北大文革史，章文提供的史料十分丰富。而“论从史出”应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方法，论点应出自史料。而“以论代史”，以理论和观点代替史料、史实，是研究、阐述历史的错误方法。章文列举了大量史实，述说了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反吴传启、反王、关、戚的来龙去脉，比较有说服力。

常风文中对1966年10月到1968年8月这段北大文革史，加叙加议，涉及许多北大文革史中的具体事件和人物。笔者愿意与常风先生共同切磋、探讨。

3、孙蓬一在文革中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笔者认为孙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错误是，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从左倾的立场出发，反陆平，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坚决批判刘邓的“资反路线”，坚决炮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孙蓬一在文革之初被调到中央文革办公机构，1966年10月在聂元梓要求下被调回北大任校文革常委，负责学校运动。1967年3月孙升为校文革第一付主任。孙是做为陆平党委和张承先工作组的对立面进入校文革的，他参与、组织了多次对陆平、彭佩云的批斗大会。1966年11月19日，聂元梓、孙蓬一，在毛泽东通过李

讷的指示下，去上海串联，炮轰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资反路线。

对孙蓬一坚决执行毛泽东文革路线这一主要错误，常、章二人的文章都语焉不详。章铎在史料中一带而过，没有十分明确的评论。常文则侧重孙的主要错误是对邓小平的态度。

一，孙蓬一签名了那张大字报《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10月1日后《红旗》杂志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大学生都明白这是指向刘邓路线。11月全国形成批资反路线高潮。在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做了检查。邓的检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因此11月8日聂、孙等11人所贴批邓的大字报并无轰动效应，影响有限。

二，邓朴方被批斗致残一事似与聂、孙有关。常文写道“邓朴方经过严刑逼供、威胁，被逼跳楼，至人终生残疾。”“聂元梓和孙蓬一犯下的这个错误可以说是他们所有错误中最致命的。”并认为这是“导致他们在文革后被判刑的主要原因。”常风的意思，是由于文革后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而邓朴方是邓的亲骨肉，因而聂、孙获罪与“邓核心”的“心结”有关，常风认为这是导致他们后来被判刑的“最致命的错误”。这一看法与民间许多人的看法近似，有一定道理。先不论聂、孙获罪、判刑，是否源于个人恩怨，是否公道，是否领导人的报复心理所致。聂、孙在文革的最大错误应在政治方面认定，他们在文革初期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坚决与刘邓“资反路线”斗争，这应是他们在文革初期（主要是从1966年5月25日到1967年1月这段时间）最大的政治不正确。这也是当时北大99%的师生，不论是那一派，共同的政治倾向。

关于常文把邓朴方“被逼跳楼，至人终生残疾”，这笔帐算到聂、孙头上，是有违事实的。

首先，邓朴方受伤致残的时间是1968年8月31日。8月19日工军宣队进校，从即日起聂元梓、校文革被工军宣队全面夺权。这时是工军宣队主政，聂元梓已失去自由被审查。此事确实与聂元梓、孙蓬一无关。

邓榕在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章“邓

朴方的遭遇”）一书中，明明白白写道：“8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刻骨铭心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抗议。”邓榕写的是“8月末的一天”，并说这一天“刻骨铭心”，显然就是指出事的那一天。邓榕并写了受伤是因为“跳楼”，而不是因为“严刑拷打”。邓朴方受伤致残。

邓榕的“跳楼”之说较接近事实，但不够准确。事实是，邓朴方是技术物理系62级学生，当时他被关在北大东门外物理楼四楼一间房里。邓朴方想逃走回家，他从四楼外墙抓着水管往下爬，因水管已朽，突然断裂，结果他摔了下来，脊柱受伤，致残。邓朴方同班的三个同学得到学校通知后，立即赶到出事地点，邓朴方躺在地上，同学看到四楼一个窗户大开，邓朴方用手指指着四楼，意思是他从四楼那个窗爬出来，摔到地上。同班同学把邓朴方抬上三轮平板车，把他送到北医三院抢救。笔者曾看到抢救邓朴方的同班同学所写的文字材料，证明邓朴方“并非自杀”“也无人推他”；邓在“扒下水管”时在二或三楼处摔下；事发时间是“8月末”，当天就通知了住在29楼的邓楠（北大物理系学生）。邓朴方本人从来没有讲过他是被聂、孙派人“严刑逼供”，“被逼跳楼”而“致残”。邓朴方从未如此作证。

4、关于聂元梓、孙蓬一到上海串联

常风写道：“1966年11月19日，聂元梓与孙蓬一等人秉承江青、王力旨意，到上海煽动造反派批判曹荻秋、杨西光等，并把常溪萍拉到会场批斗。”此处不够准确。事实是，聂、孙去上海串联，首先是直接秉承了毛泽东主席的旨意，江青、王力只是遵照毛泽东的旨意，随后跟进、执行、落实。

1966年11月12日、13日李讷（毛泽东女儿）两次到北大校文革找聂元梓单独谈话。13日，李讷对聂元梓讲“主席同意你去上海串联。”“你要宣传主席的思想和路线。”“现在主要是发动群众，全国的运动搞不起来，光是你北大搞也不行。”“北大的运动要等一

等。”“希望你们做出成绩。”¹李讷12日、13日两次到北大校文革找聂，当时办公室人员及校文革常委都看到了。14日，聂元梓召开校文革常委会议，传达了李讷的谈话及毛主席的指示。对这个背景，有个重要旁证，王力在《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指出“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联，把北京和上海联成一片。”²江青、王力是在毛泽东通过李讷直接对聂元梓做了指示后，跟进、执行。江青告诉聂元梓“用北大群众组织名义去上海。”

章铎文章中，对李讷到北大传达毛泽东要聂去上海的旨意，引述了李清昆的旁证。李清昆说“那天（1966年11月12日）上午，李讷到北大6院二楼组织组，我、孙蓬一、夏剑豸、陈葆华、付治文都在那里，聂元梓当时不在。她（李讷）给我们说‘你们不要老盯着北大，要放眼全国。我们了解，现在上海的造反派受压，主席想让北大的造反派去支援上海的造反派，我这次来就是谈这件事。’”第二天13日李讷又单独与聂元梓谈话，传达了毛的旨意。14日聂元梓召集校文革常委会议，传达了与李讷的谈话，研究、布置了去上海串联一事。此事有许多旁证，证据链完整。李讷文革后对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否认此事，但这不是李讷想否认就否认得了的。这一史实的重要性在于，这对了解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很重要。1966年11月，毛泽东已把目光投向上海，要把北京、上海的造反大势联成一片。尔后到了1967年1月，毛泽东便从上海引爆了一月夺权风暴，以华东影响全国。毛泽东于1966年11月通过李讷亲自指示，让聂去上海，那是他下的一步棋。其实无论是毛泽东亲自指示聂去上海造反，或是江青、王力指示聂去上海，这二者没有本质区别。中央文革是毛的文革办事处，执行的是毛的文革路线及有关部署。而无论是李讷或是江青传达毛的旨意要聂去上海串联、造反，聂、孙所犯错误的性质也是同样的，其错都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文革错误路线的政治、思想之错。但问题是按照1983年《北京日报》所宣传的那样，认定聂、孙去上海串联、造反，炮轰上海市委的“资反路线”，其性质是“参与推翻人民

¹ 《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第十章第一节，第183-185页。

² 《聂元梓回忆录》，出处同前，第191页，附录：《王力反思录》）摘要。

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那么，“要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主谋、主犯是谁呢？

在1966年9月至12月，北大两派学生99%都出去到全国各地串联过，外出的学生到了外地（包括上海），99%都是造反派，“炮轰”、“火烧”各地省、市委，批判“资反路线”。在外地，北大两派学生没有分歧，十分一致。学生们并不是要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而是在《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炮打司令部》等中共中央文件的指引下，去捍卫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学生们因幼稚，跟着党犯了错。这是当时的大气候、大潮流，聂、孙去上海造反之错，就是在这样的大气候、大潮流之下犯的政治思想错误。

5、关于1966年“井”、“红”的政治倾向

常文说1966年“在北大出现了以‘井冈山’、‘红联军’为代表的怀疑反对中央文革和聂元梓的群众组织和学生。”笔者认为这个论断的后一半是符合事实的，即“井”、“红”是反聂元梓的群众组织；而前一半论断说“井”、“红”反中央文革是言过其实了。“井”、“红”什么时候反中央文革了？常文没有提出证据。北大的“井冈山”、“红联军”出现在1966年10月至12月，其纲领很明确就是反校文革、反聂元梓，而且是站在比聂元梓更左的立场上反对聂的左，嫌聂不够左，批聂右了。

北大第一次分裂始于1966年10月6日。这一天出现了二份反校文革、反聂元梓的大字报。随后很快诞生了“井”、“红”。那是前后一致的反聂思潮。让我们回顾一下他们的观点和倾向。

10月6日，物理系路远、周闯贴出大字报《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批判聂元梓主张斗黑帮要文斗，不要戴高帽、不要搞喷气式，是“温斗”。批判聂元梓不同意成立红五类子弟协会而“一再强调绝大多数同学”，不满聂元梓不搞血统论。他们的目标是北大必须再次“乱”。追求的是个“乱”。

同一天，经济系杨勋也贴出大字报，批判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了一条右倾保守

的改良主义路线。”杨勋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他们站在“左”的、“激进”的立场，指责聂元梓、校文革是“右”，是“保守”。

随后有许多大字报响应路远、周闯及杨勋。由高干子弟为骨干组成的“毛泽东主义红卫”也亮明了反校文革、反聂立场，他们认为聂元梓不够左，而且不满于自己不能掌握领导权。随后不久出现的“井”、“红”也持同样观点。同时，出现了许多反击反校文革、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这派大字报认为，主攻方向是李雪峰、张承先的错误路线，而不是反陆平、反工作组的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聂元梓执行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一派学生后来组织了“红旗兵团”、“北京公社”、“东风兵团”等红卫兵组织。

常文说“井”、“红”反中央文革。1967年9月7日“井冈山”出版的《新北大报》，刊登编辑部的文章：《粉碎二月复辟逆流，恢复“井”“红”本来面目》，该文写道：“‘红’、‘红’在十二月份顶恶浪、战黑风，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明确地讲到“井”、“红”在1966年12月，是“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而不是反对。应当说当时有这样的态度是正常的，两派绝大多数人当时都是这样对中央文革表态。引用到这里，只是证明常文所言不实。

常文以生物系学生樊立群为例，想说明“井”、“红”这一派学生反中央文革。其实樊立群并不是“井”、“红”成员，但他的观点与“井”、“红”是一致的。1967年1月6日，樊立群在大饭厅的辩论大会上，批判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刘邓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丝毫没有批判聂元梓、校文革执行了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这是樊的基本政治立场和观点，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樊要抢占的政治正确至高点，正是中央文革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樊立群不是张志新，不是王申酉。他在紧追文革的大潮流，要求校文革更左。

1月19日樊立群贴出一张大报《康生是什么人？》似乎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樊立群在大字报中批判康生搞“封、资、修”，揭发康生参观潘天寿（著名画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浙江美院院长）画展，并题字“画坛师首、艺苑班头”。文革时潘天寿被打

成“反动权威”、“反动画家”。陈一谔在其《回忆录》中对与自己同一派的樊立群的此份大字报的评论是：“他贴康生的大字报，是认为康生左的还不够。”陈一谔说“我对他许多过于极端的痞子想法和厚黑作法并不苟同。”¹樊立群炮打康生的目的，是因当时北京高校、中央党校有股反康生的风潮，他是想赌一把，如果康生倒了，正如他曾对同伴讲的“康生是聂元梓后台”，（樊的根据是聂元梓曾按照周恩来、康生指示把经济系教师杨勋押送去公安部），这样聂元梓就得垮台，证明他樊立群一贯正确。新北大公社也会跟着聂垮台、解散。正如樊立群在后来5月17日成立“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时的《宣言》所言，他与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师生的矛盾是路线斗争，声称“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余地。”，他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观察、对待校文革和“公社”的群众。《宣言》说新北大公社“是大杂烩”、是校文革的“御用工具”，矛头指向了几千名师生。《宣言》说“校文革在校内外顽固地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要与聂元梓的资反路线斗争到底。所谓资反路线即严重的右倾路线。聂元梓反陆平、反工作组、到上海串联反上海市委、这明明都是过左，樊立群却把聂的左当成右来批，他岂不是更左？1967年的北大，左倾狂潮一浪高过一浪。这就是当时的大环境、大潮流。樊立群并没有反潮流，而是顺着文革的潮流在前端飞跑。

樊立群是生物系学生，在北大文革中很活跃。校文革因其坚定的反校文革立场，曾长期对其打压。武斗时，“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对樊关押、殴打，打断他一小腿骨。这是惨无人道的罪错。对樊的这一不公正遭遇，笔者深为同情。

6、关于聂、孙、“新北大公社”反王、关、戚

章铎一文用大量史料叙述了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于1967年反王、关、戚的来龙去脉。常风不同意章的观点，认为：章铎讲“聂、孙反对潘梓年、吴传启，

¹ 《陈一谔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第113页。

反潘、吴就是反对王关戚，反王关戚就是反‘四人帮’。这是不能成立的。”章的观点能否成立，要看史料。首先，章文所叙述的史料，多处讲到聂、孙、直接反对王、关、戚的事实。其次，反吴传启是否就是反王关戚，这取决于反吴传启与反王关戚的内在关联。章认为潘、吴搞极左，结党营私到处夺权，而王、关、戚支持他们，是潘、吴后台，因此为着缩小风险，不能直接、公开反王、关、戚，便通过反潘、吴，来反王、关、戚，抵制极左路线。这在事实和逻辑上都是站得住脚的。但章文有个概念不够清晰，章文说反王、关、戚就是反“四人帮”，把王、关、戚与“四人帮”画上了等号。“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泽东于1974、1975年几次批评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在第十届中央政治局中搞小宗派时说的，特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四人帮”倒台后，《人民日报》的文章及一般群众时常把“四人帮”的概念扩大到文革中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估计章铎应是因此之故，把“四人帮”与中央文革等同视之，其说法不够严格。但从实质上看，聂、孙、“公社”群众反吴传启，反王、关、戚，客观上就是反了中央文革的极左路线，只是主观上并不自觉，主观上以为是在捍卫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

下面捋一下聂、孙、“新北大公社”直接反王、关、戚的史实。章铎在文章中提到1967年3月下旬、4月10日、5月28日、6月1日、6月了5日发生的重要事件，常文都回避了这几个时间节点的史实。3月下旬，聂元梓、孙蓬一、李玉英到解放军报社找李讷，向李着重谈了有关林杰、王力、关锋等人的问题，递交了高教部事件的“调查报告”以及王力、关锋两次打电话向孙蓬一施压的电话记录。4月10日，聂、孙求见中央文革后去了钓鱼台，见了江青、陈伯达，向江青告状，告了王力、关锋。孙蓬一在接见时说，“我们认为王力、关锋是在搞新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5月28日，陈伯达在钓鱼台单独召见聂元梓。关锋、戚本禹在座。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我们非常希望你和我们站在一起。”“你不要反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关锋则威胁说：“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的错误可能就爬不起来了。”聂元梓始终没做一句检讨，会面不欢而散。

这次“5.28”谈话十分重要，有几点值得注意：1、陈伯达明确让聂元梓“不要反吴传启了”；2、陈伯达以陶铸为例，指出反吴传启就是反关锋；3、陈伯达要聂与中央文革“合作”，隐含政治交易之意；4、如果聂不听话，不上他们那条船，会怎么样？关锋出面把狠话撂下了：“再犯大错误可能就爬不起来了。”这是对聂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从3月至6月，多次向中央文革、国务院办公厅递交了反映吴传启、林杰、王、关、戚等人问题的材料。6月1日，“除隐患”以大字报形式公布了吴传启的第一批材料。仅仅四天前，陈伯达刚刚于5月28日对聂讲过“你不要反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指中央文革）与他们（指吴传启等人）联系起来。”

在陈伯达眼中，聂、孙、“新北大公社”太不听话，于是在6月5日陈伯达发表了两次谈话（一次是6月5日清晨在北大大饭厅，一次是6月5日晚至6日凌晨在人大会堂接见红代会时），陈狠整聂、孙、狠整“新北大公社”。

6月5日晚至6月6日凌晨，陈伯达在人大会堂中央文革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上，对聂元梓、“新北大公社”说，“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陈再次不让新北大反吴传启，但话说得比以前重多了，威胁聂再反吴要“垮台”。）并且对聂、孙挥舞大棒，说“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当时中央文革威信极高，如日中天，权倾天下。陈伯达做为中央文革组长如此上纲上线，如泰山压顶，是要把聂、孙、“新北大公社”压垮，阻挡以新北大为首的反吴传启、反王、关、戚的浪潮。

在6月5日晚上陈伯达于大会堂讲话之前，在6月5日清晨，他曾首先到北大大饭厅，对聚集的学生和闻讯赶来的聂元梓讲话。在这小范围的非正式场合，他说话毫无顾及，非常露骨。在《聂元梓口述自传》第十五、十六章中（引自博讯文坛，编者谢冀亮），聂元梓说：“当然，校内反对派的崛起，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中央文革王关戚、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的唆使和支持。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67年6月5日，陈伯达对北大发难，对我发难，发表了倾向性鲜明的‘6.5’讲话。这天陈伯达到北大来，他到得很早，在大饭厅先见了牛

辉林，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我和校文革的同志得知陈伯达到了学校，就急忙赶往大饭厅，在饭厅附近遇见陈伯达。陈伯达对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你们学校越乱越好，你们校文革摇摇欲坠才好呢。他还向群众讲话说，北大是‘一潭死水’，‘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指责，是足以置人于死地的！”

陈伯达“6.5 北大讲话”，《北京大学纪事》也有记载，证实陈伯达“6.5”来到北大，“在大饭厅与群众讲话”，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陈伯达6月5日清晨在北大的讲话，第二天有人贴出大字报《陈伯达讲话》。陈晚上对红代会的讲话也很快传开。北大一下炸了锅。下面排个时间表，看看从6月6日至6月8日这短短三天，在陈伯达6月5日针对北大的两次讲话后，北大发生了什么？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6月6日，“新北大井冈山公社”（人称为“井”）成立，发表宣言，脱离新北大公社，反对聂元梓、校文革。

6月7日，“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人们称为“团”）成立，造“新北大公社”的反，造校文革、聂元梓反。

6月8日，“新北大北京公社”（人们称为“0”）成立，反对聂元梓、校文革。

此前于5月17日成立的“新北大东方红公社”（人们称为“红”，仅有几十个人，头头是樊立群）和5月22日成立的“北京大学红卫兵红旗飘战斗队”（人们称为“飘”，有十几个人，头头是牛辉林）这两个组织在5月分别发表“宣言”，造校文革、聂元梓反。他们在5月成立时没有多大反响，6月5日后突然变得活跃，有了一些影响。“红旗飘”是五个反对派组织中最左的一派。

以上即北大“井冈山”产生的背景。6月5日陈伯达讲话后，北大大乱，出现反聂、孙，反校反革，反“新北大公社”的“井、红、团、零、飘”，他们的口号是：“‘井冈山要在北大二次夺权！’”、“砸烂校文革！”、“一切权力归井冈山！”、“‘新北大公社是老保，势必垮台！’”这些口号都很“左”。这就是陈伯达讲话的社会效果，反观其动机，

效果与动机高度一致。

1967年8月7日，“井、红、团、0、飘”联合，成立“北大井冈山兵团”。

以上谈到的几个时间节点发生的事，如：3月下旬聂、孙找李讷；4月10日聂、孙向江青告状；5月28日陈伯达召见聂元梓；6月1日“除隐患”公布吴传启第一批材料；6月5日陈伯达两次讲话；6月6日至8日三天“井、团、零”成立。以上这些时间节点，其前后相连的所发生之史实，说明了什么？常风先生不能回避。

1967年6月5日以后，北大再次分裂，出现了人数众多的对立派群众组织，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派性斗争，直至发展到武斗。陈伯达的有意挑动无疑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大原因，但并非唯一原因。当时盛行的不断造反，追求大乱的极左思潮对部分师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那阵子，“造反派”是个光荣称号、是身份高尚、政治正确的名片。当时人们普遍追求站队正确，因此要争当造反派，认为造反派即革命派。这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心理。但在北大，走资派早已垮了，工作组早已撤了，继续革命革谁的命？校文革、聂、孙当权，于是成了“井冈山”“二次革命”“彻底砸烂”的目标。此外，聂、孙不能正确对待持不同意见的群众也是北大分裂的重要原因。1966年12月“井”、“红”垮台时，聂、孙处理不当，各系批判了反校文革的学生200多人。这些学生无非是思想认识不同而已，但校文革没有颁布宽容政策，任由各系本派师生各行其是。影响更大的事情则是一般不容许原“井”、“红”、“主义兵”的学生加入“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组织。这样便为后来的分裂留下了隐忧。1967年3月，郭罗基贴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第一个要整风》的大字沾报，大字报出于善意，但用语尖刻。随后化学系“新北大公社”0363战斗队发起多次给聂、孙提意见的大型串联会。这时部分“公社”的师生对提意见的人进行压制，贴出许多大字报，斥责提意见的人是“反校文革逆流”、“要砍毛主席树立的新北大红旗”。聂、孙对这种错误做法没有制止，从而形成师生间的对立。陈伯达看准了北大的这些裂缝，利用北大内部矛盾，掀起北大内战的巨浪。其目的，是扑灭新北大点燃的方兴末艾的全市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反谢富治，反极左思潮的熊熊烈火。

7、社会冲突与反极左

常风认为“新北大公社”、聂、孙反潘梓年、吴传启不等于反王力、关锋。笔者认为，新北大反潘、吴与反王、关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学部联队潘、吴搞形左实右，得到了王、关、戚、谢富治的支持。而聂、孙、“新北大公社”反对潘、吴，就是反了他们的后台，并且会自然上升到直接反王、关、戚、谢。这就是政治斗争的逻辑，并已被大量史料所证实。

新北大聂、孙派与学部联队潘、吴派之间从1967年1月夺权风暴开始出现的斗争及其发展，章铎在文章中已有大量陈述，常风也都回避了。笔者在下面再择要捋一下当年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事件：

1967年1月新北大奉周总理指示到高教部夺权。《红旗》的林杰、学部联队的吴传启、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搞小圈子夺权，拉一派打一派，支持高教部“延安公社”的卢正义夺权。而卢正义有历史问题是叛徒，确实在狱中出卖过同志，因此遭到聂元梓、新北大坚决反对。而后王力、关锋电话严厉批评了孙蓬一、新北大，聂元梓随后带领北大师生撤出了高教部。

1月15日，学部民研所的洪涛、刘郢在潘、吴支持下，把全国政协和统战部的机密档案抢劫一空，遭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民族学院以郑仲兵为首的“抗大公社”和统战部群众把洪涛、刘郢等人扭送公安部，洪、郢却得到了谢富治的保护，第二天就把人放了，并发表讲话封抢档案的人是左派，反过来把反洪涛打、砸、抢的民院“抗大公社”的郑仲兵关押了十几天。郑仲兵到北大找聂元梓串联，得到聂元梓坚决支持。从此，民院“抗大公社”、郑仲兵与聂、孙、“新北大公社”成为反潘、吴的坚定战友，并都对谢富治不满。

4月8日，在民族宫批判修正主义民族路线展览会的筹备期间，地院“东方红”等高校的地派，在学部吴传启、洪涛等人支持下，于8日下午包围了北大学生进驻的民族宫，对

“新北大公社”学生实行武力清场，于9日凌晨3:30把北大学生全部赶出了民族宫。

4月11日下午，地院“东方红”等六所高校的宣传车闯入北大，大喇叭高喊：“新北大公社是新保守派！”“聂元梓必须从红代会滚出去！”后来这六辆车被北大学生扯掉了广播线，变哑吧了，北大学生把六辆车推出了北大校门。

“4.8”、“4.11”事件表明，由于新北大公社、聂、孙反对学部联队潘、吴一派到处伸手抢权，搞打、砸、抢，因而他们便拉一派打一派，煽动地派学生反新北大。反新北大的后后就是王、关、戚、谢。

以上通过1967年1月至4月的一连串社会冲突事件，表明聂、孙、“新北大公社”在1967年已从反右转向反左，从反社会上的极左思潮，走向反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王、关、戚、谢富治。孙蓬一的“4.12”演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

“4.11”地派六辆宣传车闯入北大挑衅后，北大师生群情激奋，孙蓬一于4月12日在大饭厅召集“新北大公社”全体大会，并发表演讲。这个演讲是反极左、反吴传启的宣战书，不指名地抨击了学部联队一派的后台王、关、戚。孙在演讲中说“真正的‘摘桃派’”“如学部以吴传启为首的一帮子人，如高教部的‘延安公社’、中央统战部的‘红色联络站’。”孙指出他们的手法是“采取拉一伙，打一伙，拉拉扯扯，勾勾搭搭，招摇撞骗，把手伸得很长很长，真正是拉大旗作虎皮。”指出他们在搞小圈子，排斥异己，到处伸手夺权。孙指出有人要“垄断、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这不是指吴传启等人，他们不够资格、不够份量，而是指“大人物”王、关、戚“要垄断、独占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常文说潘梓年在文革后获得平反，证明历史清白。但这并不能证明当年学部联队潘、吴一派跟着王、关、戚跑，搞极左，到处向中央夺权就是正确的。潘的历史问题并非当时两派斗争的焦点。

清华“井冈山”蒯大富、北航“红旗”韩爱晶在2月至4月这段时间对“新北大公社”聂元梓、民院“杭大公社”郑仲兵等反学部吴传启、洪涛，是持观望态度。到了5月，老蒯、韩爱晶也加入到攻打吴传梓的行动。其实所谓的“天派”、“地派”并不是阵线很清

楚的两派，地院“东方红”王大宾只是左了一些，被人当枪使了。真正对立的两派，是派中之派，一派是学部联队、一派是新北大（口头叫法）。学部这派有吴传启控制的学部“红卫兵联队”、洪涛控制的民研所“红色联络站”、卢正义控制的教育部“延安公社”、谭厚兰控制的师大“井冈山”。他们听命于《红旗》的林杰。这个小圈子的行动相当一致，口号、行动都很左，有强烈的排他性。他们到处伸手抢权。一旦有什么冲突，王、关、戚便以中央文革名义出面支持他们。新北大这派有：北大校文革聂元梓领导的“新北大公社”、人民日报“井冈山”王若水、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阮铭、民族学院“抗大公社”郑仲兵以及石油学院的“大庆公社”、中央音乐学院的“北京公社”、北京轻工业学院的“红鹰兵团”、北京外语学院的“红旗公社”等。这派的共同特点是：反极左，反吴传启，反王、关、戚，对谢富治强烈不满，对“二月逆流”的几个副总理“一批二保”，反对打倒。坚决保周（周恩来）。新北大当时成了反极左、反王、关、戚的中心。新北大得到了军队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冲派”对立面）的支持，聂元梓与高等军事学院的“红高联”有密切联系。新北大派在1967年5月一发动反学部吴传启的攻势（此时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也参加了进来），极左派就全线震动，王、关、戚便被逼到前台施压，施压无效，于是重量级人物终于出马，陈伯达在6月5日二次针对北大讲话。6月5日之后，北大“井冈山”出世。当年聂、孙、“新北大公社”师生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谢，是在校外，而不是对内，是层层向上，矛头向上。斗争方向是反极左。最难能可贵的是，当年聂、孙、“新北大公社”广大群众是冒着巨大风险，以进攻态势反王、关、戚。这便是1967年北京两派斗争的全局概况。

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于1967年反极左，反吴传启，反林杰，反王、关、戚、谢，是北大文革史的一大亮点。新北大当时已背离了毛泽东的文革轨道，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矛头不是指向党、政干部中的“走资派”，而是指向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政治倾向不是反右，而是反左。1968年3月2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宣布打倒杨、余、傅。首都红代会代表列席了会议，北大聂元

梓、马云龙参加了此会。江青在大会发言中说“右倾翻案是当前主要危险。”并批评聂元梓“我要你反右，你偏反左。”第二天马云龙在北大广播台传达了“3.22”林彪、江青的讲话。3月27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打倒杨、余、傅的10万人大会上，江青讲话时，又一次公开批评聂元梓反左是“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新北大是反左的，以上都是有可查的重要证据。

就在江青多次批评聂元梓反左不反右的那段时间，聂元梓在俄文楼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上讲：“‘中央文革’提‘中央文革’的政治口号，我们提我们的政治口号，当前不是右，而是‘左’。我们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是要反‘左’。”¹这证明当年聂、孙、“新北大公社”师生反极左已上升到高度自觉的状态。而当年新北大这种反左的立场是上下一致的，例如“新北大公社”的“红梅战斗队”就曾于1967年5月底贴出过一份有重大影响的长篇大字报《评反革命极左思潮》，指出反极左是斗争大方向。把“极左”加上“反革命”的冠词是指向极左的代表人物，是明指吴传启，暗指林杰、关锋。今天反思文革，当年反左无疑是个正确方向，因为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就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新北大坚持反极左，是朝着正确方向逐步觉醒。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聂、孙、“公社”群众摆脱不了历史的局限性，还跳不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正确这个大框架。

8、关于聂元梓、孙蓬一炮打谢富治

常文写道，孙蓬一在1967年的“4.12”演讲中“情急之下口无遮拦才喊出‘炮打谢富治’的口号。”常风强调回顾文革要“真实”地反映历史，这点确实很重要，因为历史的真相往往就体现在真实的历史细节之中。笔者在“4.12”现场，不记得孙蓬一在演讲中“喊”过“炮打谢富治”的口号。为慎重起见，笔者查对了相关资料，找不到孙蓬一喊过这句口号的记载。这应是常风记忆有误。孙蓬一虽然对谢富治不满（因1月19日洪涛等人

¹ 《聂元梓回忆录》中《我的上诉状》，出处同前，第425页。

抢国家机密档案受到谢保护），但“4.12”讲话的锋芒并没对准他。而是针对吴传启及其背后的王、关、戚。但“4.12”讲话从情绪上激发了北大师生批极左派的斗志，引发了随后发生的新北大第一次炮打谢富治。新北大首次炮打谢富治发生在4月13日、14日两天。

4月13日，谢富治在人大大会堂接见红代会代表，解决“4.11”北大与地院的冲突。北大的聂元梓、孙蓬一、胡宗式参加了会议。在接见会上，谢富治表面公允，不让北大和地院讲话，却让随地院到北大闹事的其他五个院校发言，结果北大成了挨批对象，被诬指“挑起武斗”。这明显不公平且颠倒了是非。谢富治甚至单独对聂元梓讲“武斗是北大挑起来的。”消息传出来，北大师生议论纷纷，明明是地院等六校跑到北大校园闹事，并不是北大去了地院啊。怎么把责任推到北大头上？再说，北大也没人动手打人呀。那有这么不顾是非，拉偏架，偏帮地院的呀。这不是拉一派打一派嘛！13日晚上，许多学生自发地聚集到大饭厅议论谢富治对4.11事件中北大学子的批评，孙蓬一即席讲话，表达了对谢富治的不满，说他不公正，但也没有喊“炮打谢富治”。当晚及第二天北大许多学生自动跑到市内贴大标语“炮轰谢富治！”等。还有一批人去公安部要和谢富治“讲理”。聂元梓听说后，赶紧派人去盖掉前面人贴的谢富治的标语（难免有漏掉的），同时派人去公安部找谢富治“讲理”的学生拦住，劝回学校。这是13号晚和14号发生的事。这就是聂元梓、新北大公社第一次炮打谢富治。4月13日下午，聂元梓、孙蓬一在小范围议论，“看来谢富治和王、关、戚是一伙的。”¹过了一、二天有人告诉笔者，城门楼上仍贴有大标语“新北大岿然不动！”大街上还有标语：“谢富治算老几？”、“炮轰谢富治！”（署名都是新北大）。这应是漏掉、没盖上的标语。“4.12”、“4.13”事件动静很大。

1968年春季举办北京高校两派学生组织负责人学习班期间，聂元梓要批判王、关、戚，揭露他们分裂高校的问题，受到市革委会学习班领导的压制。为此，聂元梓掀起新北大第二次反谢高潮，闹得全北京市都知道。

常风确认了聂、孙炮打谢富治的事实（只是具体过程有分歧），这也是当时北大两派

¹《聂元梓回忆录》，出处同前，第215页，第十一章第六节。

及全北京市民都知道的事实。那么新北大反谢，对不对呢？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对聂元梓说：“你拥军是对的，反谢是错的。还有你派人到38军这事办的好。”这是有案可查的权威性证据。文革后聂元梓对人们说：“今天看来，我们拥军和反谢，都是正确的。”¹

不能说凡是反谢就是正确，也不能简单地说反谢就是要夺市革委会的权，要看是为了什么。在“1.15枪档案事件”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北大人不糊涂。此外，吴传启在关锋、戚本禹的指使下，派了以周景芳为首的100余人进入市革委会和北京日报，与谢富治狼狈为奸。这是新北大由反吴传启进而炮轰谢富治的重要原因。周景芳于1983年1月被北京市委开除党籍。谢富治于1983年10月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许多更严重的罪行被揭露。历史对此已做了结论。

9、牛辉林的“8.9演讲”

牛辉林“8.9演说”的背景是，武汉“7.20”事件发生后，全国声讨武汉军区司员陈再道。《红旗》在“八一”社论中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目前，全国正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后来得知，这个《社论》是林杰、关锋、王力起草。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动员令。在王、关、戚的煽动下，7月、8月二个月，全国曾爆了“毁我长城”的反军高潮，全国很多省、市发生了部分群众冲军区，抢武器，批判“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甚至揪斗解放军高级将领的风潮。这是王、关、戚极左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这股极左思潮曾严重地影响到北大。

北大“井冈山”勤务组头号负责人牛辉林于8月9日在38楼东侧召集“井冈山”全体大会，做形势报告。牛辉林在演说中，分析全国的形势，极力夸大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严重、尖锐，举了很多全国各地军队镇压群众和造反派（按：指1967年群众组织重新分裂

¹ 谢冀亮编：《聂元梓口述自传》第十六章结尾二个自然段，博讯网。

后的反军派)冲击军区、军队的事例。号召北大“井冈山”再次开始新的全国大串联，到全国各地去反“军内走资派”。下面是他演说的摘要(据油印传单记录稿)：

“66年二月兵变确有其事，李井泉警卫员已经揭发。他们曾经决定将兵变转到67年2月，所以有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军内走资派是二月黑风制造者。”“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说：根据陈再道过去的表现，知道他会暴乱。”“徐向前、叶剑英、陈毅在颐和园开秘密会议，陈毅秘书揭发的，说‘7.15’全国大乱。”“从此可以看出是党内军内一小撮在密谋策划。”“通过几个月的支左运动完全暴露了军内走资派。”“军内问题解决之后会出现一个大转变。可以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造反派队伍。”“新北大公社在外面，支左还是支保？”“聂元梓公开支持‘保’字号组织，简直不能容忍。”“38军是坚决支左的。(暗示38军支持北大“井冈山”，聂反38军。)”“聂孙他们在校内外挑起武斗，企图在全市挑起更大规模武斗，炮打谢富治，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新北大公社是聂孙的御用工具。”表示北大“井冈山”“已走了1300人，我们在各地基本上有人了。”

以上是“牛辉林8.9演说”的摘录，占他全篇演说的大约五分之一的内容。他在报告里，小道消息猛忽悠。他的这个“演说”有几点值得注意：他紧跟《红旗》社论，明确提出“军内一小撮”、“军内走资派”；点了三个老师的名字：徐向前、叶剑英、陈毅；表示“井冈山”已有1300人到全国各地反军；攻击聂元梓、“新北大公社”支持保守派；重提陈伯达“6.5”讲话，说聂“炮打谢富治”，“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农夺权。”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8月12日(“8.9”演说三天之后)， “‘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总部勤务员牛辉林在校内又一次作形势报告，说‘全国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要‘揪军内一小撮’。”

牛辉林当时在北大迎合了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思潮？历史已对此做了回答。当然对牛辉

林而言，这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他是在紧跟《红旗》社论，认为是在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牛辉林毕业后在北大开展清查“5.16反革命集团”时，被调回学校接受审查。他在大会上承认自己是“5.16分子”，其实他根本不是，他只是受了极左思潮的毒害，后来证明是冤案，离校参加工作。

“新北大公社”没有参与各地的反军活动（除了个别在外地没有及时撤销的联络站自己做主张之外）。当时有谣传说聂元梓、“新北大公社”反38军，牛辉林也造这种舆论。聂元梓派“公社”总部负责人卢平和“除隐患”战斗队队长赵建文二人，为此专程去保定拜访了38军军部，进行辟谣，与38军首长座谈极好。此事最有力的证据是，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毛泽东对聂元梓讲“你们拥军是对的”，“你们访问38军这事做的好。”这是有案可查的。

1967年8月，在那个炎热的盛夏，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全国阶级斗争的温度也达到了顶点，各地“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军浪潮高涨，到处发生抢枪事件和大规模武斗，运动严重失控。毛泽东为稳住军队，握牢军权，抛出了王力、关锋做替罪羊。毛泽东针对“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批示“还我长城”。并指示杨城武回京转告周恩来关押、审查王力、关锋。对戚本禹暂时没动（想争取他回头）。

8月27日，与聂元梓、“新北大公社”来往密切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军队冲派的对立面）抄了林杰在《红旗》杂志的办公室。

8月30日，周恩来召开中央文革扩大会议，揭批王力、关锋“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是“毁我长城”，反军乱军，干扰、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会议还批判了王力的“8.7讲话”是企图打倒陈毅，在外交部夺权。

9月1日，周恩来、江青、中央文革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公布了王力、关锋的罪行及其倒台。随后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10万人群众大会，公布了王力、关锋的罪行。陈伯达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小爬虫王力、关锋！”

9月，北京两派（指新北大派与学部联队派）斗争形势骤变，“学部红卫兵联队”、

潘梓年、吴传启迅即跨台，吴传启逃跑，不久被北京卫戍区抓捕。周景芳（戚本禹安插在北京市革委会的秘书长）及潘梓年、林聿时、洪涛、刘郢、王恩宇都被北京卫戍区收监。

那时北大校园内的气氛是，“新北大公社”的人个个兴高彩烈，许多人到海淀下“馆子”，聚餐，喝啤酒，特高兴。当时，聂元梓及“公社”总部三令五申，不许“公社”群众游行、欢呼、贴大标语庆祝，不许攻击“井冈山”。“学部总队”（学部反吴传启一派）到北大贴大标语“新北大是坚定革命派！”“坚决支持新北大公社的一切革命行动！”

1968年初戚本禹被关押、审查、垮台。1967年的极左狂潮画上了句号。

当年“井冈山”部分师生受极左思潮影响，反对聂、孙、“公社”反王、关、戚，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文革后期，“井冈山”师生对文革的极左思潮、对王、关、戚的极左路线，早已幡然醒悟，有了明确认识。

10、北大武斗

北大武斗，两派都有责任，都有错误。当年校园内的武斗并非国与国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没有正义一方。但校文革做为权力机构，支持并指挥一派进行武斗，责任更大，尤其是孙蓬一有着重大责任。

北大的武斗不是突然爆发，有个酝酿过程。1967年7月10日，校文革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布置工作，“飘”、“零”等校文革反对派冲会场，围攻聂元梓、推搡、殴打孙蓬一。同一时间，“飘”、“零”等打、砸、抢，抄、封了二组（学校保卫部），抢了机密档案；同时砸了“南阁”（哲学系文革办公室）。“新北大公社”师生举行了游行抗议，但采取了克制态度，两派并没发生武斗。

7月10日“飘”、“零”等抢、抄、封二组是个严重事件。二组是学校保卫部。1966年8月工作组撤走后，工作组组建的“保卫组”（当时称“二组”）因保卫工作的特殊需要被中央批准保留下来。当时“二组”是由海军保卫部、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以及最

高人民检察院的人组成，不参加学校“文革”运动，专门负责学校安全保卫工作（维护校内治安、配合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承担对重点专家、来校首长、外宾的警卫）1966年底，北大保卫组的军队干部按照中央批示撤出北大，学校又陆续抽调了部分教师、学生、干部充实保卫组，正式取消了二组称谓。保卫组名义上隶属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但实际上延续了原二组的工作性质和任务，接受市公安局和公安部的业务指导，独立工作，不参加校内群众运动。保卫组从来没隶属于任何群众组织，包括“新北大公社”。也从未收集、保存过群众的材料。

1967年7月10日凌晨3点陈伯达又一次来到北大的大饭厅，与群众讲话，煽动北大继续分裂、打派仗。就在这次会面将要结束时，在场的一个人（据说是“井冈山”的宣传部长）对陈伯达说：“我们北大有个二组，专整群众黑材料！”陈伯达立刻不假思索地回答：“那就让他们停止工作！”就是陈伯达这一句话，意味着新的打砸抢和揪斗就要开始了！

7月10日天刚亮，有大批“井”、“飘”、“零”学生涌进保卫组，宣布：“根据伯达同志指示，保卫组停止工作，我们代表革命群众查封保卫组！”随后把保卫组人员全部赶走，由“井”、“飘”、“零”查封、接管了保卫组。紧接着“井”、“飘”、“零”用大字报宣布从二组查抄出大量北大师生的“黑材料”。由于当时保卫组有严格纪律，不参加学校运动，也不能受所谓“运动”的影响，也从没搞过什么师生的“黑材料”。所以保卫组底气很足，向全校告示：保卫组从来没有搞过构陷学生、教师的“黑材料”，并强烈要求有关群众组织公布这些所谓的“黑材料”的内容。这一告示发出后，“井”、“飘”、“零”铺天盖地的所谓“黑材料”风波戛然而止了，他们声称的抄出来的师生“黑材料”始终没有公布。整个事件是以“莫须有”之名搞打、砸、抢、抄、封，破坏治安机构，践踏法制。而此事全是在“陈伯达指示”下发生。陈伯达为什么对如此严肃的涉及治安机构的事情，不做调查就轻率表态？唯一解释是他唯恐北大乱得不够，因此抓住个由头就立马

煽呼、挑事。¹

1967年12月30日，“井冈山”绑架了新成立的中共北大领导小组副组长、校文革斗、批、改负责人崔雄崑（文革前任北大教务长），当天校文革召开抗议“井冈山”绑架革命干部崔雄崑全校大会。两派对立情绪骤然升温。

1968年1月16日晚，“新北大公社”邀请西藏“大联指”演出队来北大演出。两派群众都坐在大饭厅等待观看演出。“井冈山”武斗队却抢走了“公社”的广播喇叭，同时打、砸校文革办公室，抢走了校文革公章，挑动武斗。“新北大公社”迅速维持好秩序，恢复了演出大会的正常运行，使文艺演出得以顺利进行，著名歌唱家才旦作玛也做了精彩演出。此次“公社”又一次采取了克制态度，双方没有打起来。

1968年1月，“公社”许多战斗队觉得“公社”总部窝囊，对“井冈山”的武斗挑衅太软弱。1月17日在留学生食堂，“公社”的“红色进军号”战斗队发起炮轰“公社”总部“右倾”的串联会，许多人强调“公社”在武斗中受了损失，对“井冈山”太软弱，要求总部对“井冈山”采取强硬立场。

到了2、3月，两派都组织了武斗队，武斗人员头戴柳条帽，手拿木棍或长矛。长矛是用铁管截成、一头磨尖，十分锋利，是杀人武器。“井冈山”占据了28楼做为文攻武卫指挥部，把“公社”的学生赶出了28楼。“公社”占据了44楼做为文攻武卫指挥部，44楼原是北大招待所。此时双方时有小冲突发生。大约在3月20日左右，公社总部得到报告，历史系一位“公社”的学生，在28楼附近遭到两名手持长矛的“井冈山”武斗队员袭击、追赶，遇刺，幸亏这位学生较警觉，且是田径运动员跑得快，后背只受了皮外伤，没有生命危险。

3月26日前，北大两派武斗局面已经形成，双方时有小冲突，但尚未发生大的武斗事件。有些回忆文章，认为北大武斗扩大、升级是在3月29日，笔者认为此说法不准确，应

¹ 根据保卫组成员、法律系三年级学生蓝绍江：《我亲历的北大文革中的保卫组和‘7.10’事件》摘要，引自《华夏文摘》增刊第931期。

是在 25、26 号两天。

3 月 25 日下午，地院“东方红”等七个高等院校“地派”的学生近万人，人人手持铁棍，从北大各校门湧进校园，与北大“井冈山”武斗队汇合，要挑起大规模武斗。“新北大公社”师生见状，纷纷加筑工事，准备一战。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她得到情报，即将在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后台是支持“地派”的谢富治，而谢还有后后。目的是一旦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出现人员伤亡，就可以把罪名扣到聂元梓头上，从而拔掉聂元梓这颗“钉子”。聂元梓得知紧急状态后，立即赶往市革委会面见谢富治，强烈要求谢富治到北大制止武斗发生，否则出了大事谢必须负责。于是谢只好随聂在傍晚赶到北大。谢富治到北大广播台，在大喇叭里讲：“外校学生都离开北大，回自己学校去。北大师生在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领导下闹革命。”聂说谢富治讲完话以后“外校学生呼拉一下子都走了。”

（《聂元梓回忆录》第十三章第八节 264 页）。为考证此事，我查看了孙月才公开发表的《文革十年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12 年出版，出版社存有孙月才日记的影印件。）该日记第 298 页 1968 年 3 月 25 日星期一这一天记载了：“下午形势紧张，井冈山联合外校、农大东方红、新人大公社，准备对我新北大公社搞大规模打、砸、抢。新人大、农大东方红进校了，并打伤了我们不少人。新北大公社为了自卫，大运石头，筑工事，空气紧张异常。晚 7 点左右，谢副总理、吴德同志、丁国钰同志亲临北大广播台作重要广播讲话。谢副总理指出：一、希望北大的两派在校文革的领导下，在聂元梓领导下联合起来。二、‘打倒聂元梓’的口号是完全错误的。三、外地、外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是错误的。”孙月才是“新北大公社”负责人，他当天所记的日记，可信性不容置疑。孙月才说 25 号下午来北大武斗的外校，只提到二个：农大东方红、新人大公社。而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是七个学校，其中有地院东方红。25 号下午有大批外校地派学生湧入北大，支持北大“井冈山”，企图挑起大规模武斗，是确有其事。否则谢副总理便不会在当晚的北大广播讲话中的第三条说“外地、外校的学生到北大来搞武斗是错误的。”将来研究北大文革史的人，可以去查谢的这个讲话，在北京市政府的历史档案中应可查到。

《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在 1968 年 3 月 25 日这一日期的条目下，有三段记载：

3 月 25 日：“地院东方红”、“新人大公社”等造反组织近万人聚集北大，进行反聂、孙游行，并发生武斗。

同日，地院、农大、北邮等院校红卫兵开广播车到北大校内宣传，声援北大“井冈山兵团”。

晚，谢富治、吴德、丁国钰赶到北大讲话，制止武斗，要求“所有外校外地学生一律退出北京大学。”说：“到北大来武斗是错误的。”

以上《纪事》对 3 月 25 日的三段记载，与孙月才的《日记》及《聂元梓回忆录》的回忆大体一致。聂元梓曾在文革后的法庭审讯时，指控这是有高层人士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一场由校外到北大校内的大规模武斗。幸而在聂元梓强烈要求下，谢富治及时赶到北大化解了危机。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谈到在法庭预审时，她详细申辩了不是她挑起武斗，而是在 1968 年 3 月 25 日谢富治策动地派万人到北大支持北大“井冈山”，要挑起大规模武斗，而她逼迫谢富治到北大制止了大武斗。为此预审进行不下去，进行调查。而后一位姓陈的预审员告诉聂：“在制止武斗的问题上，你是立了一功的，你给党中央写一个关于制止武斗的情况报告吧。”这样，聂向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陈。迟早有一天，以上这些资料会被全部解密的。

到 3 月 25 日晚 9 时，北大回归风平浪静。一场大规模武斗被制止。25 号下午，北大没发生大型武斗冲突，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因此人们可以批评“井冈山”企图借用外力挑起大规模武斗。但只是企图而已，并没有真正发生。校文革、“公社”总部该收手时不收手，反而要出手。25 号深夜和 26 号，孙蓬一控制的“公社”武斗队主动出击，攻打井冈山，真正挑起了武斗升级。25 号深夜，“公社”“钢一连”攻打“井冈山”广播站。此事

被“公社”驻“红代会”代表马云龙（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看见，他无法制止，三天之后他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大字报，声明反对校文革、公社总部挑起武斗，声明辞去“公社”驻“首都红代会”代表身份，声明退出“新北大公社”，以示抗议。马云龙对朋友讲，“‘钢一連’胡来，孙蓬一昏了头。武斗会死人的，我才不会去替校文革背黑锅呢。”第二天3月26日，“钢一連”又“占领了29楼，把楼里“井冈山”一派的学生都赶走了。当天“公社”作战部开会，负责人之一索世索破口大骂孙蓬一，说他扩大武斗，是“胡闹”、“混蛋”。作战部全体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孙蓬一挑起武斗升级是绝对错误，作战部绝不支持也不参加武斗，但也很无奈。这是“公社”内部一部分人的反应。他们被“公社”武斗队讥讽是“机派”（右倾机会主之“机”）。

3月29日，“公社”武斗队占领了化学系宿舍31楼，把“井冈山”一派的学生驱赶出31楼。那些天孙蓬一到“公社”占据各楼视察，他一左一右站着两个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一个是丁建华，一个是宫香正。当时丁、宫二人被火线提拔进入“公社”总部，丁建华任武斗西线总指挥、宫香正任武斗东线总指挥。当时强硬派孙蓬一已掌控了校文革、“公社”总部的实权，并直接指挥武斗。

3月29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到北大视察，制止武斗，聂元梓陪同。他们走到28楼“井冈山”总部楼下时，迎面走来3、4个“井冈山”的人，动手就打。李钟奇的头部被打了一个大包。有人用刀子划伤聂元梓的头部，血流了一脸，染红了上衣。后经检查、包扎，只是皮外伤。

4月24日之前，“井冈山”陆续占据了28、30、32、35、37楼。每占一个楼，手持长矛的武斗队便逼迫“公社”一派的学生搬走，把他们的衣、物、行李、被褥扔出门外、窗外。“公社”占领了44、29、31、34、40楼，同样“粗暴地把“井冈山”同学赶走。

4月25日，“井冈山”又占据了36楼。孙蓬一不顾校文革内部高云鹏等人反对，决定反攻36楼，发生了一场攻楼和保楼的武斗，双方石矢如雨，双方有不少人受伤。由于“公社”仰攻二楼，受伤较多，攻楼失败。

“井冈山”占了36楼后，在二楼架设大弹弓对准38楼下面的人行道，曾有“公社”学生大白天在38楼下走路，无端遭到“井冈山”弹弓射击，飞来大石打中脸部，打落牙齿，满脸流血，脑震荡。

4月27日，“公社”武斗队又占据24、25、27楼。“公社”对“井冈山”形成了包围圈。

从3月26日至4月27日，“公社”与“井冈山”的两派武斗队，就是这样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步，我一步，步步升级，把整个校园变成了武装割据的冷兵器战场。

4月27日，无线电系学生殷文杰从他所住42楼（两派混住宿舍）出来，走到44楼前面，被人认出是“井冈山”的，被“钢一连”的两个武斗队员刺伤。公社的胡宗式恰巧在场，立刻把殷文杰送往721医院抢救，但终因伤重不治身亡。

武斗发展到7月，校文革对井冈山占据的各楼，不时实行停水停电。两派的大喇叭不分日夜扩播，吵得海淀居民不得安宁。有时两派的武斗队在校外马路上对打，阻断交通。这时两派的绝大多数人都已成了逍遥派，两派坚持武斗的估计也就各有七、八百人左右，分别只占两派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公社”人多，武斗人员也相对多一些。两派绝大部分师生厌恶武斗，拒绝参加武斗，很多同学都离校回家，自我放假了。绝大部分群众以逍遥方式抵制武斗，这85%的两派群众代表了当时比较正确、正义的方面。当时北大两派参加武斗与逍遥派的人数比例，从后来工军宣队进校后两派上缴的武斗工具，可以测算出个大概。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1968年8月20日“新北大公社”上缴长矛930支、铁棍200根。8月21日“井冈山”上缴长矛749支、铁棍71根、大弹弓8个、小口径子弹37枚（手枪没上缴，幸好没用）。如以80%武斗工具在武斗人员手中而有20%库存备用计，那么“公社”武斗人员有900人左右，“井冈山”武斗人员有700人左右。（实际人数应少于这个数字，“井冈山”一位武斗人员说他们最少时只有200多人。）当时学校师生员工总数在11000人以上。这说明参加武斗的积极分子只是极少数人，但他们控制着局势。两派绝大多数群众无可奈何。两派都被个别激进的头头所控制。群众运动的规律是

越运动越激进，谁激进谁上台，谁激进谁话事，理性的声音被压制，理性的领导者靠边站。例如当时“新北大公社”总部反对武斗、力主大联合的李文等人，就被孙蓬一批评“右倾”而失去话语权。

北大、清华的武斗已是天怒人怨，丧尽人心。红卫兵运动已脱离了毛泽东的文革轨道。毛泽东不是神，运动已失控。造反派对毛泽东已失去利用价值。毛泽东就势于1968年7月28日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严厉批评了清华、北大的武斗，指示工军宣队进驻高等院校及上层建筑领域。从此，清华、北大武斗结束，红卫兵运动终止。此后，毛泽东放弃了利用群众的力量推进运动，而以军队的力量为骨干，恢复、重建中共的党国体制。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谢静宜的回忆书《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该书176页中写到，当时毛主席对谢静宜说：“现在工厂的形势比较好，大多数工厂都联合了，形势逐渐好起来，唯有学校的形势不好。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这时主席非常生气，继续说：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本派的大多数。他们的头脑膨胀，全身浮肿……。”谢静宜披露，在1968年7月24日，毛主席向她交待任务：为制止清华大学武斗，“我的意见是临时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去同他们讲理。去宣传‘要文斗，不要武斗’，宣传中央制定的‘七三’、‘七二四布告’。至于先去北大还是清华，请北京市商量定。哪一个学校问题最严重，就先去哪个学校，捅它这个马蜂窝。”

从以上毛泽东对谢静宜讲述的决定在“7.27”采取重大战略行动，派工军宣队开进清华，可看出毛当时的心态和心理活动：1、对红卫兵运动严重失控，毛泽东很恼火，说“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也不听。”2、毛很清楚校园里坚持武斗的人员是少数，说他们“也脱离了他本派的大多数。”清楚地知道武斗已丧尽人心。3、毛决心抛弃造反派，以新的力量代替学生运动。他让8341部队“组织两三万工人和部分农民参加的队伍”，组成工军宣队开进清华、北大，“捅它这个马蜂窝。”毛此时对造反派头头的憎恶之情溢于言表。4、毛

指示要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这两个布告是针对广西等边远省份，是杀气腾腾的布告，布告开了个口子：允许动用军队镇压坚持武斗的群众组织。这时，毛已不惜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霹雳手段，恢复各地以革委会为主体的党国秩序了。

11、关于孙蓬一反对大联合、指挥武斗的错误

常风在文章中对孙蓬一指挥武斗的错误做了尖锐批评。章铎在文章中公布了孙蓬一的检查，应也确认了孙蓬一的这一重大错误。章文引述了孙蓬一对工军宣队做的书面检查，孙承认“我不是团结两派群众共同把斗争矛头指向阶级敌人，而是站在一派一边，支持武斗，指挥武斗。”章、常二人对孙蓬一的这个重大错误没有原则分歧。

孙蓬一在1967年反吴传启，反王、关、戚、谢，反极左思潮。但到了1968年，他自己也陷入了极左思潮的陷阱。文革的极左路线要追溯到中共中央1962年八届10中全会制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党的基本路线，“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条路线直到文革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被终止，而代之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的新路线。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阶级斗争路线的大实践，毛泽东在文革中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推至极端，发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全党、全国斗，斗，斗，陷入了阶级斗争的大乱局。孙蓬一在1968年，不断讲“路线斗争没有调和余地。”，他把“公社”与“井冈山”两派群众的思想认识分歧，视为路线斗争，一定要把对方打垮，甚至不惜用武斗把对方压垮。究其错误根源，盖因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来认识北大两派的派仗。泛阶级斗争观念扭曲了孙蓬一的人性，他善良的天性被阶级仇恨所压倒。正如常文所言：“文革这个从潘多拉魔盒中放出来的魔鬼扭曲了许多人的人性和良知，使他们变得残酷无情。”“这些人并非生下来就穷凶极恶，而是在阶级斗争观念的驱使下，认为对方就是国民党余孽，就是坏人，而自己是紧跟领袖干革命。”

其实北大两派群众在一段时间内，何尝不是程度不同地与孙蓬一犯了类似错误。北大

两派学生在17年所受的教育中，长期接受阶级教育、兴无灭资教育、反修防修教育，崇拜领袖教育，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教育，都是喝狼奶长大的。在文革中两派群众都信神，都无限崇拜伟大领袖，紧跟伟大领袖，反陆平，反工作组，炮轰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后来找不到敌人了，就群众自己和自己斗，相互指斥对立派是错误路线。阶级斗争观灌输给人们的是仇恨和斗争，是把人群撕裂成对立的阵营。两派学生受泛阶级斗争观念的毒害，人性中的狼性被激活。两派学生生活在一个校园内，本应相互尊重，却相互敌视；本应相互友爱，却相互斗争；本应和谐相处，却相互攻击。武斗是阶级斗争观对部分学生侵蚀至深的表现，阶级斗争观竟然发展到要伤害同学人身的地步。如果说文革在某种程度上是人性中的正、邪大战，那么它存在于每个人的人性之中。因此这是人们应普遍反思之事。而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曾经信奉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更应深刻反思，重新认识。

文革中，北大两派学生，都曾迷失过、迷惑过、彷徨过，而后又逐步觉醒。今天大家再相遇，自然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笑谈暴风雨，携手向未来。我们共同缅怀北大文革那暴风雨的岁月，是为着共同记取我们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为构建和谐社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一分光和热。■

【专稿】

文革初期的北大

——浅析张承先的《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

古樟

前言

1. 中央决定派工作组到北大，是在第一张大字报广播之前
2.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北大燃起文革烈火
3. 6.18事件及工作组的《九号简报》
4. 张承先对陈必陶大字报的变脸
5. 聂元梓是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吗？
6. 关于7.25、7.26大会的倾向
7. “把复杂的阶级斗争搞到第一家庭里的”不是张承先
8. 工作组顺利撤出北大

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

前言

探讨北大文革的历史，必然要涉及到文革初期的工作组及其组长张承先。张承先著于1998年的《文革初期的北大工作组》一文（以下简称“张文”），提供了当事人的回忆，是一篇重要的材料。这篇文章，笔者最早见于《百年潮》1998年第5期。北京市委的资料库《宣讲家》收录了此文。一些网站和博客也进行了转载，影响广泛。没有经历北大文革

的人读了之后，就会把文章讲述的全部内容当成事实。而真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张文”有一段话讲得非常好：

“北大问题”是文革的导火索之一。北大是文革初期所谓工作组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发源地。这一段历史，对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着重大的意义。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我把这一段亲身经历如实记录下来，供后人指点评说。

作为曾经的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在这篇文章中披露了一些当年北大学生所不了解的情况，如张承先是如何到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那里领受任务的，他是如何处理“六·一八事件”的，陈伯达和曹轶欧在处理“六·一八事件”上是如何表现的，以及此后他受到吴德和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的批评，等等。

作为当年的北大学生，笔者以为，“张文”对于我们回顾文革初期北大的情况是有益的，但是，文章中的有些提法和记述与事实不符，有的还颇有出入。遵照张承先“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的教导，笔者从一个普通学生的角度，就“张文”所述作一些回顾与探讨，希望能更多地还原历史真相。

一人一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革经历。笔者当年只是一个普通学生，见闻非常有限，没有能力还原当初纷繁复杂的校园情景，只能就事论事，讨论“张文”提及的几件事情。

1. 中央决定派工作组到北大，是在第一张大字报广播之前

毛泽东在打倒彭、罗、陆、杨的同时，就把目光投向了北大。《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

5月11日 阅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张恩慈写的《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这份《意见》对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在领导北大“四清”运动方面，以及北大在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少尖锐的看法。毛泽东审阅

时把标题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意见》，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十三日，刘少奇批示：“此件请即印发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同志。”¹

当时的北大学生当然不知道这一重要背景，《意见》的文本也未见公布。1966年6月初，孔繁和张恩慈曾经在北大的大饭厅作过关于北大“四清”的报告，内容可能与《意见》差不多，但那不是全校大会，许多同学并未听到，笔者就毫无印象。张恩慈原为北大哲学系教师，北大“四清”中的左派，后调往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张离开北大的原因，可能同北大“四清”后期左派的遭遇有关。张恩慈后来又成为康生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下属调查小组的工作人员，在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产生过程中，张恩慈起到了承上启下、穿针引线的作用。

据上引《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文字可以知道，参加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员（约80人）都看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批发的这份《意见》，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北大问题的态度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清楚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公开保陆平党委了。

《毛泽东年谱（1949—1976）》还载有：

5月29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三十日，刘、周、邓关于派临时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致信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三十一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报社领导班子。²

另据《周恩来年谱（1898—1976）》，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商定向人民日报和北大派工作组的事之后，“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³ 这就是说，在毛泽东还没有见到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时候，一线的中央领导人就已经决定向北大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了，这一决定获得了毛泽东的同意。6月3日，毛泽东审阅了

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86页。

²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88页。

³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76）》（电子版），第1123页。

新华社有关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新市委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两篇电讯稿，分别批示“已阅。同意。”¹

《毛泽东年谱（1949—1976）》记载：

6月1日 阅康生报送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4]，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六月二日在《人民日报》等报发表，《人民日报》还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和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提出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和“破四旧、立四新”。²

限于篇幅，引文略去了若干注释，但这一段的注[4]明确记载：“康生报送毛泽东的是《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5月27日编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刊载的这张大字报。”

很清楚，康生上报的并非坊间所传的大字报“底稿”。按照“张文”的说法，“曹轶欧派人将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康生背着当时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将大字报直接送给在外地的毛主席”，似乎是康生搞的一个阴谋。实际上，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为会议定下基调的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就是由康生传达的，这次会议虽然由刘少奇主持，却由康生负责向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请示。³《周恩来年谱（1898—1976）》也明确记载，“会议按照毛泽东四月在杭州会议上的部署进行，康生负责向在外地的毛泽东汇报请示。”⁴另据《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五卷第588页：“5月21日 康生通过电话向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

¹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0页。

²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第589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2013年12月

³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⁴ 《周恩来年谱（1898—1976）》（电子版），第1123页。

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情况，请示准备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问题，并在大会上宣布，以及江青等人提出让姚文元参加文化革命小组等。毛泽东表示同意。”所以，康生向毛泽东报送《文化革命简报》在当时属正常之举。这种分工，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如周恩来于5月31日向毛泽东报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涉及到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重大问题，¹ 这是由周恩来管的事，当然由周报送。《文化革命简报》是《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联合编印的，其编辑部门如何运作，《简报》印多少份，上报范围有多大，以及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稿件是如何到他们那里的，都不得而知。按常理说，此类《简报》不会只报给毛泽东一人，其他领导人也会收到。顺便说一句，学部的吴传启在5月23日贴出了大字报，教育部的卢正义在5月26日也贴出了大字报，《文化革命简报》想必也是刊载了的，不知道有没有上报给毛泽东。将来的学者，倘有条件对这一时期的此类“简报”（包括《文汇报》驻京办事处的“简报”）、“内参”等作一番研究，将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聂元梓等人5月25日贴出的大字报，5月27日被刊载在《文化革命简报》上。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中央机要部门尽管用飞机来运送报给毛泽东的各种文件和报刊材料，也需要一定时间。所以，这一期《文化革命简报》送达毛泽东手里时，已是6月1日中午了，毛泽东当即作出批示，并且给康生、陈伯达打了电话。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同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到6月1日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²

毛泽东的批示传到北京，已是下午了。时间很紧迫，执行得很匆忙。笔者当晚听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播出的只是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全文，并无按语，更没有播毛泽东的批示。笔者愚钝，听了广播还搞不明白，这是作为正面材料来广播的呢？还是作为反面材料要批判的呢？按照1957年的前车之鉴，先广播，再批判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¹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出处同前，第589页。

²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对于当晚的广播，北大有三类人最为明白，一是北大的左派，二是陆平党委及其支持者，三是学生中的高干子弟（他们早已知道《五·一六通知》的精神了）。张承先率领一部分工作组成员进驻北大，在半夜召开骨干会议，大部分普通学生是不知道的。不知内情的学生们，要到第二天早晨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刊摘要节目，听到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才会明白过来。

2.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北大燃起文革烈火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宣称：“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两篇新华社电讯。第一篇电讯是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兹不赘引。第二篇电讯宣布了新改组的北京市委的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很清楚，陆平、彭佩云是中央要打倒的，也是被中央打倒的。派张承先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之事，虽然早在5月29日已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会决定并经毛泽东同意，但正式派出，用的是新市委的名义。

6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社论将北大“四清”运动后期的国际饭店会议定为“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社论说，“陆平等这一小撮保皇党，拼命抵制和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对一批积极

分子进行的这种残酷斗争，竟长达7个月之久。这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当时的北大学生，都是解放后长大的，从小就受到共产党的教育，都认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等等，传播的都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都是真理，作为学生，只能学习、紧跟，是不容许有丝毫怀疑的。特别是自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在国际上开展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国内开展了“四清”运动，报刊上早已充斥着种种批判文章，北大学生的头脑中，已经被灌满了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意识。经过多年的宣传教育，学生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也已达到很高的程度。另外，自开展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运动以来，火越烧越旺，报刊批判文章的调子越来越高，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充满了火药味。因此，在这一系列急风暴雨般的鼓动之下，北大学生一边倒地声讨“陆平黑帮”，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这也是多年来中国的大学当局对学生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必然结果。北大有上万名年轻学生，中央媒体发表一张大字报，再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便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了。

工作组进北大后，很快向全校师生传达了《五·一六通知》及其附件，传达时还特别说明，这份文件中的许多段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所以，《五·一六通知》将来是要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听了传达，师生们无不感到震惊、骇然和气愤，震惊、骇然和气愤之余，便把怒火撒向了“陆平黑帮”。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5月25日贴出的，从那时起，直到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有一个星期之久。在此期间，大字报作者和一些支持大字报的人，都受到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围攻。少数不明真相的学生，在某些干部（包括某些和学生接触最多的团干部）和教师的引导下，参加了对“左派”的围攻。“张文”称，“大多数师生员工认为：这是一张用诬蔑不实之辞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就当时而言，公开支持和反对大字报的人都是少数，反对大字报的人虽然气势汹汹，但那

是表面上的，其中的许多学生是被利用的，他们并不能代表“大多数师生员工”。“大多数师生员工”，特别是普通学生和职工，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并没有发声。另外，还有一大批师生在外地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他们还不知道大字报的事情。再说，“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算什么问题呢？5月8日《解放军报》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同日《光明日报》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不是早就将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了吗？

这种情况在6月2日发生根本性转折，出现了全校师生一致声讨“陆平黑帮”的浪潮。很快，参加外地农村“四清”的师生也回到学校，参加到这一史无前例的浪潮中来。这一回才是真正的“大多数师生员工”呢。一些参加过围攻“左派”的学生认为自己被欺骗了，他们表现出了更大的愤怒，他们的行动也更为激烈，矛头所向，首先是前几天带领或鼓动他们围攻“左派”的老师。这同后来“六·一八事件”的发生，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因果关系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组进校后，首先面临的是全校师生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群情激愤，批判“陆平黑帮”的火爆场面。毛泽东说：“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¹但是，张承先看不到这一些，在他的眼里，情况是走了样的，“张文”写道：

6月2日，《人民日报》……随后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社论，把聂元梓封为“革命左派”。这就在北大引起了更大的震动。而聂元梓则认为她胜利了，向“围攻”她的人展开了猛烈反击，校园内出现了混战局面。从6月1日到6月6日，校内共贴出大字报五万多张。每天来北大看大字报的近万人，许多学校派人来声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种强大的舆论下，迅速激发起来。

北大广大师生紧跟中央的行动被视作聂元梓个人的“反击”，全校一边倒批判“陆平黑帮”的场面被视作“混战”，这与事实完全不符。6月2日之后，谁和谁“混战”呢？

¹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出处同前，第593页。

当然，这一段话里也有符合事实的部分，“从6月1日到6月6日，校内共贴出大字报五万多张。每天来北大看大字报的近万人，许多学校派人来声援。”五万多张大字报，每天近万人的参观者和声援者（其中有社会各界的群众，有一次还来了一大批警察），如此规模，是聂元梓等人“反击”能做得到的吗？这不都是广大人民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行为吗？中央改组了北京市委，成立了新市委，消息公布后，北京市群众敲锣打鼓，游行庆祝，欢迎新市委，这又是谁的“反击”呢？

6月2日以后，全国许多地方都燃起了文革的烈火。后来连毛泽东都说：“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¹为什么全国都轰动了？难道也是聂元梓“反击”造成的吗？

张承先对文化大革命和北大形势的认识是混乱的，他无法站在前面领导这场运动，工作组最终被撤走也就是必然的了。

3. 6.18事件及工作组的《九号简报》

烈火在北大已经燃起，《五·一六通知》等中央文件的传达，以及《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发表的一篇又一篇的重磅文章，更是火上浇油。

相对于中央的一系列举措，相对于各大报刊的一篇又一篇社论，相对于北大师生被煽动起来的革命激情，张承先及其工作组无疑远远地落在了后面，这中间的矛盾很快便爆发出来。另外，报刊社论对“陆平黑帮”的问题上纲很高，帽子很大，但工作组领导下的系一级会议上的揭发批判却空洞无物，这也产生了矛盾。这些矛盾的结果，便是开始出现了过火的斗争行为，先是零散的，到后来发展为乱批乱斗的“六·一八事件”。

张承先把这些过火的斗争行为归罪于聂元梓，“张文”写道：“在聂元梓发动的这场斗争中，斗争方式简单粗暴，打人、骂人、揪头发、撕衣服、戴高帽子游街，使北大的混

¹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出处同前，第9—10页。

乱状态不断升级。”

有过火行为的北大学生在当时也只是少数，要考证这些过火行为的渊源，其实同聂元梓并没有什么关系，倒是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点关系。那个年代的学生们都要学习《毛选》，学的最多最熟的，就是《毛选》第1卷开头的几篇文章，学以致用，恰逢文革，就模仿了一下。另外有重大关系的，是《五·一六通知》和一系列社论，“彭、罗、陆、杨”是“反党集团”，陆平党委是“黑帮”，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这不都属于敌我矛盾吗？他们不都是最危险的敌人吗？对他们，还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吗？

北大校友奚学瑶在他的回忆录《青春非常之旅——我的文革印迹》¹（以下简称“奚文”）中回顾了这一思想历程：

大学生们也不甘落后，以毛泽东《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为思想武器，经常念着这样的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也学当初湖南农民的样子，给“黑帮分子”戴上高帽，有的甚至将装便纸的铁丝篓扣在他们的头上。6月18日，一个批斗“牛鬼蛇神”的高潮掀起来了，各系纷纷将本系的“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拉到学生宿舍区批斗，有些学生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采取了激烈的行动。

另一位校友唐利在其《我的北大文革记忆》²（以下简称“唐文”）中有大体相同的记述：

六月十八日，趁工作组正在开会之机，哲学系带头，不经批准，建立“斗鬼台”，拉来陆平一伙斗争，全校不约而同，各单位群体揪斗，既没有请示工作组，又出现了过火行为。

那一天我觉得到处乱哄哄，人群骚动，原来大家决定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

¹ 丛璋、亚达、国真编辑整理 北京大学文革回忆资料汇编《燕园风云录》（一）自印书，2012，第101页。

² 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j/ljsj/article_2012022254193.html 2012-02-22 （2015年11月5日检索）

一段话办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觉得既要革命，就要像个样子，比如像湖南的泥腿子一样，搞搞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上街游行。

“唐文”还写到化学系的乱斗现象：

又听到化学系有革命行动，我往那赶，一路上不断看到游街的，有的年长，有的年轻。到化学楼，斗的是党总支委员桂琳琳，……几个女生架着她，头发散乱，面色苍白，双眼紧闭，任凭愤怒的人群七嘴八舌地吼叫。

“唐文”在评述毛泽东的那一段话时写道：“毛的这句话在文革非常著名，是文革中一切过激行动堂而皇之的合理外壳，非法行为有恃无恐的理论。”北大的学生为什么会这样子来应用毛泽东的这段语录呢？这是一个至今仍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要复原“六·一八事件”的过程，已经不大可能。上引“奚文”和“唐文”所述，不过是一定距离之外的旁观者的印象，被斗者和斗人者，他们基本上都不认识。马生祥的《文革初期北大见闻录》一文，¹指出38楼东门被斗的有历史系20多人，其余是哲学系师生，“马文”还列出了9名被斗者（其中历史系8人，哲学系1人）的姓名和职务。作者是历史系学生，又住在38楼，是距离较近的观察者，所以认得这些人。“马文”所列出的有姓名的9位被斗者，职务不过是团总支书记、年级党支部书记或辅导员等（其中有调干生），罪名则是“修正主义苗子”、“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保皇派”之类。他们之被揪斗，当有多种原因。笔者以为，原因之一，可能是他们在聂元梓等人大字报贴出之后采取了保陆平党委的态度，并且“误导”了学生。另外，他们平时生活在学生中间，是随手抓得到的人物。

工作组控制了学校和各系的领导权之后，张承先于6月15日在全校13000人的群众大会上做了动员报告。张承先回忆说：“这个报告的基调和指导思想是‘左’的，但在当时也起到了安定人心的作用。”我们现在找不到张承先这个报告的文本，但随后发生的

¹ 马生祥：《文革初期北大见闻录》，原载《文史精华》2006年第7期。

“六·一八事件”，说明报告并未起到“安定人心的作用”，工作组也没有起到领导作用。

对“六·一八事件”的产生起到刺激作用的，还有6月16日的《人民日报》。对此，李雪峰比北大校友记得还清楚：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匡亚明》的消息和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这篇社论无疑给北大的学生点了一把火，因为学生们认为陆平的问题比匡亚明大得多，而且是中央点了名的，但是至今未被斗争过。由于陆平等领导被工作组隔离，他们找不到，于是他们就斗那些能找到的人。¹

时为北大学子的李海文在其《1966年夏北大见闻》中也有记录：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斗校长的消息，并发表社论肯定这种作法。这个消息引起一些同学的不满，他们说南大斗了校长，北大还不斗。何况北大领导是第一张大字报点的名。言外之意，认为北大工作组太右了。²

“六·一八事件”是一个自发的群体性事件，参与的人很多，场面非常混乱，工作组对乱斗现象进行制止是对的，但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和定性显然与实际不符。

“六·一八事件”当天晚上张承先作了一个广播讲话，讲话的全文无可查考，我们现在所见的，只有当时哲学系学生陈焕仁在日记中记下的一段话。这一段话颇长，兹不赘引。但张承先在这个广播讲话中，确实是把“六·一八事件”说成是“一起极端严重的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事件”，说这是“背着工作组捣鬼，企图借此赶走工作组。”³

口头讲话难免有不准确之处，毕竟制止乱斗现象是当务之急。但是，工作组还有一个《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下文简称“九号简报”，见附录）和《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是报送中央的。这两个文件不同于口头讲话，是严肃的事情，笔者不得不略作探讨。

¹ 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载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513页。

² 李海文：《1966年夏北大见闻》，载丛璋、亚达、国真编辑整理《燕园风云录》（一）自印书，2012，第47页。

³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这两个文件在当时都是秘密的。《九号简报》虽经刘少奇批转全国，但在北大群众中并未传达。同年7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文宣布撤销这个文件。¹《九号简报》现在可以查到，但《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笔者尚未见过。

我们无从知道《九号简报》起草的过程，按照张承先的说法，“我们领导小组把处理‘六·一八’乱揪乱斗事件的情况写成了‘九号简报’”。张承先代表领导小组承担了责任。

《九号简报》的起草和上报，无疑是匆忙的。工作组并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凭借的大概是当天下午工作组开会时汇集的情况，其中颇有一些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材料。这些材料似是而非，工作组未作查证核实，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写成了《九号简报》并将其上报。

关于被揪斗的人员身份和人数，《九号简报》说是“斗了四十多人。在这些被斗的人当中，有重点人，也有些有问题的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两个反动学生。”张承先的回忆说，“前后有六十多人被揪斗，多是一般干部。”被揪斗的人员里并没有陆平、彭佩云等人，也没有各系的一把手，“多是一般干部”，“还有两个反动学生”，这正说明这是一起没有组织、没有计划、没有预定目标的“乱斗”行动。有的人可能正好从附近路过，被揪来批斗。

关于乱批乱斗的情况，《九号简报》写道：“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当时情况比较混乱。”这一描述是符合实际的。张承先的回忆所述，与此相同，只增加了“还发生了多起污辱女同志的流氓行为”一句。

《九号简报》点了4个“坏人”的名字，例举了他们的“恶劣行为”。张承先手里大概保存有《九号简报》，所以在多年后写文章时仍然引用了其中的内容。我们无法核查这些情况的准确程度，但其中所说的东语系一同学的情况，则明显与事实不符。据询东语系校友，当时张承先在大会上点了他的名字，但系里同学认为，该同学并不是张承先所说的

¹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出处同前，第608页。

那样的“坏人”，并未将其当作“坏人”对待。至于指该同学“有流氓习气，人称‘小阿飞’”，则完全是无中生有，是《简报》作者的刀笔手法。东语系是培养小语种外语人才的，招生时的政治条件就颇严格，对于犯错误的学生，处分起来是很严厉的，故系里的风气一向较好，决无“流氓习气”和“小阿飞”存在的空间。该同学实际上是一个不错的人，毕业后为某大军区录用，一直在军队工作。张承先在数十年后的回忆录里重复当年无中生有的诬陷之词，毫无反省之意，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问题在于对“六·一八事件”的认识和定性。如果说这是“乱批乱斗”，是符合实际的，别人难以反对，但上纲为“反革命事件”，并无根据，无法使人信服。《九号简报》称，“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带头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的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这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张承先回忆当时情况时也说：“这场乱揪乱斗是有人预谋和策划的”，“这很可能是内外结合、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九号简报》虽然没有“反革命事件”的提法，但所作分析给人的印象，就是“反革命事件”。而且，产生于同一时间段的《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是将“六·一八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据张承先回忆，该报告系曹轶欧签字发出，张并未过目，但张事后仍为此承担了责任。张说：“我是工作组组长，报告的指导思想是我的，至于谁批发，那只是个手续问题。”

张承先在“六·一八事件”的当晚作了广播讲话后，学生们连续三天进行讨论，对照、检讨，参与乱揪乱斗的人更是个个要作检讨。作检讨的人数应该在100人以上，大多是一、二年级的学生。于是，北大校园恢复“平静”或“冷冷清清”。白天，学生们关起门来学习报刊。到晚上，则有“积极分子”组成的巡逻队打着手电四处巡逻。“奚文”回忆道：“当晚，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发表了一个声色俱厉的广播讲话，强烈谴责师生们当天的行动，认定这是一个有预谋的、内外勾结的反革命事件。此事被工作组写成简报，上呈当时刘少奇主持的党中央，又由党中央转发全国各地。与此同时，工作组在校内追查反革命，

给一些参与6月18日的积极分子以很大的压力，我们班的一位干部子弟便曾为此不思茶饭。这么一来，北大便出现了冷冰冰的局面，似与初期的火热大相径庭。”“唐文”回忆道：

“我们各班文革小组是层层追查的最底端，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被要求彻查6.18那天所有同学的表现，哪些人有异常，参加了过火事件，大家都要反思，批判出轨行为，深刻认识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自己当然是左派，出身不好，表现‘落后’的同学成了追查的重点。运动搞到了学生头上，一时间，风云骤变，人人自危。文革会不会又是一次引蛇出洞，疑云四布。”“唐文”认为，“6.18是北大运动的急转弯，大方向从批黑帮批反动学术权威转到了整学生，学校里笼罩着肃杀冷清的气氛。”

工作组上报了《九号简报》和《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但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对于这两份文件中的一些纯属推测的不实的内容，没有进行核实和修正。相反，他们开始把矛头指向学生。

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要整群众的，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们进入北大以后，按照以往搞运动的路子，把群众分成左、中、右，又借“六·一八事件”整群众的黑材料。工作组指使一些学生暗中整同学的材料，而被整的学生还浑然无知。最后，因为形势发生变化，工作组匆忙撤离，这些整学生、整群众的事未能搞成。这样的事情有多少，恐怕永远是一个谜。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例子，因为后来整人者内部发生了矛盾和分裂，才被揭露出来，但那已经是很晚的事了。可以想象，倘若工作组继续搞下去，1957年反右派的情景一定会重现。

7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了社论《信任群众 依靠群众》，这可能促使北大学生对形势重加思考，对工作组的做法重加审视。

对“六·一八事件”之后北大形势提出质疑的，首先是北大的学生。陈必陶等同学于7月12日贴出了大字报，批评了工作组。工作组对陈必陶大字报采取了什么态度，下文再谈。但陈必陶大字报不仅在校园内再次掀起波澜，也触动了北京新市委的领导人，促使他们重新审视北大工作组的做法。

北京新市委的领导人吴德和李雪峰，先后对“六·一八事件”定性的问题提出了质疑，他们似乎感觉到了这件事情有点问题。据“张文”，吴德在7月15日说：“六·一八事件中好人多数，坏人极少，但好人也做了检讨，好处是警惕性提高了，副作用是对工作组的意见不敢提了。加上工作组控制得比较紧了些，运动死巴了”。一天后，李雪峰发表了更加明确的看法。据“张文”，吴德在7月17日凌晨一点半给张承先打电话，传达李雪峰的指示，说对“六·一八事件”要重新进行估计。凌晨一点半打电话，可见其刻不容缓的紧急之状。据“张文”，次日（18日——引者）上午，李雪峰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上，对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进行了批评。李雪峰说：对“六·一八事件”估计错了，这件事是万人革命的行动，估计这个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估计错了就应当进行自我批评。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十八天“轰轰烈烈”，一个月“冷冷清清”，跟这件事有很大关系。

张承先工作组并没有原原本本地向北大师生传达李雪峰和吴德的指示，他们对李雪峰和吴德的批评是抵触的。吴德向张承先作了解释，要求他转弯子，说这样检查有利于争取主动。对于吴德的好心劝告，张承先并未接受。

据杜钧福《李雪峰北大讲话的罗生门》一文，¹李雪峰和吴德，特别是吴德，对张承先的批评，比“张文”所记述的还要多一些，还要严厉一些。例如，吴德15日说了“正确处理陈必陶这张大字报是把运动搞活起来的关键”之后，还说了“这个问题搞不好，就会变成过去北大党委那样的性质”，这话已经说得很重了。再如，吴德在7月17日凌晨一点半给张承先打过电话后，当天早上8时，又召见了张承先，话很严厉：“你的立场哪里去了，你的党性哪里去了，竟然如此地顽固不化，如不改正，你是要栽大跟斗的！”

《九号简报》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据李雪峰回忆，6月19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加上批语转发了这份简报，20日就下发全国了。李雪峰写道：“刘少奇认为牛鬼蛇神出动了，和毛主席的看法有分歧。”²刘少奇没有发现，《九号简报》对敌情的估计是错误的，是

¹ 见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j/ljsj/article_2014012299470.html （2015-11-5 检索）

² 李雪峰：《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从“6.18”事件到“7.29”大会》，载张化、苏采青

建立在推测想象之上的，缺乏证据，是经不起推敲的。直到数十年后张承先写回忆文章，也没有拿出《九号简报》中所称的“六·一八事件”是“内外勾结、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的证据。《简报》中被点名的几个人，也够不上“牛鬼蛇神”。刘少奇轻信了《九号简报》，“认为牛鬼蛇神出动了”，匆匆忙忙将其批转全国，后来成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源头。可以说，张承先工作组的错误判断，对刘少奇无疑是有误导的。

数十年后的文革史学者也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时“上纲过高”，“结果不仅压而不服，而且授人以柄”。¹

据杜钧福《李雪峰北大讲话的罗生门》一文，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前，在6月23日李雪峰“反干扰”讲话到陈必陶等人大字报发表之前的十几天里，北京新市委李雪峰、吴德等领导人对北大文革的立场和对“六·一八事件”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中央文革康生、陈伯达的态度也有了转变，但发生这种变化的动因，以及这段历史的细节，尚待研究。

4. 张承先对陈必陶大字报的变脸

1966年7月12日下午，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五名同学贴出了《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这大概是全校第一份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写这样的大字报，是要有勇气的。这张大字报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引起了各方面不同的反响。

“张文”说：

1966年7月12日下午，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五名同学贴出了《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批评了工作组在运动中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工作组领导小组决定通过这张大字报，进一步贯彻“放”的方针，把运动搞活。

这是多年后张承先写回忆文章时的说法，而当初的事实并非如此。张承先及其工作组，

主编《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分析与反思》，出处同前，第514页。

¹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出处同前，第34页。

一开始并没有这样的认识。

“唐文”写道：

7月12日，地球物理系的陈必陶五人，首先贴出了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石破天惊。张承先回应，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向工作组夺领导权。……在北京新市委吴德的一再强压下，张承先硬着头皮，做了几次检查。一时间，批工作组大字报纷纷上墙，只是调门不一。

笔者未能找到这张大字报的全文，但陈焕仁所著《红卫兵日记》记载了其内容概要和工作组的反应：¹

7月13日 星期三 晴

《人民日报》今天没有发表我们的信，陈必陶等5同学，却在六食堂南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在全校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我们对当前运动的看法》，大字报一共十多张，至少四五千字。大字报首先肯定了工作组进校领导运动的成绩，接着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了他们对运动的意见：一，各班、年级和系、校成立文革运动领导小组，成员都是工作组内定的，没有走群众路线。二，以对待陆平旧党委的不同态度，工作组在学生中划分左派、中派和右派，是不正确的。三，运动中工作组不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由自己包办代替。四，工作组的“四不准”（即不准串联，不准公开贴大字报，不准随便揪斗黑帮分子，不准校外单位群众随便来北大串联）是束缚群众手脚的清规戒律，限制了革命师生的积极性。陈必陶等人认为，北大眼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这种局面必须迅速改变。

7月17日 星期日 雨

天下着瓢泼大雨，我们冒雨来到大饭厅，听张承先同志的紧急报告。陈必陶大字报在北大引起极大混乱，对工作组持不同观点的群众，一直盼着工作组对陈必陶大字报明确表态，听到通知，纷纷冒雨来到大饭厅。

¹ 陈焕仁：《红卫兵日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4～59页。

“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题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张承先在报告中，首先总结了前段运动，然后布置了今后的工作，点名批判了陈必陶等5人大字报，他用了很长时间，对陈必陶大字报罗列的工作组“五大罪状”，一一地予以批驳，说陈必陶等人的大字报完全是别有用心，北大的运动只能在工作组的领导之下，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部署和要求进行，决不能让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去左右，从而走偏方向。

7月18日 星期一 晴

……学校的大喇叭突然响了，校广播站宣布，张承先又要向全校发表紧急讲话。

张承先在广播讲话中，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昨天他说陈必陶大字报完全是别有用心，今天突然又说陈必陶的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张承先还在报告中承认，前段工作组的确依靠和发动群众不够，压制了群众的积极性，张承先代表校工作组，热诚地欢迎全校师生，对工作组的工作提出批评。

我们全都让张承先搞糊涂了。同是陈必陶那张大字报，他昨天定性为“别有用心”，今天竟然又说它是“革命大字报”，无论是拥护还是反对陈必陶大字报的人，听了都大骂张承先简直在开玩笑。

张承先态度的转变，是市委领导李雪峰和吴德一再做工作的结果。

据“张文”，吴德7月15日到北大听取汇报，明确说：“现在正确处理陈必陶这张大字报，是把运动搞活的关键。”吴德的指示，使工作组无法再把大字报说成“打着红旗反红旗”，更不可能对大字报的作者进行批判整肃了。

而7月18日李雪峰在市委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对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进行了批评，特别是对如何估计“六·一八事件”的问题，批评非常尖锐。对于李雪峰和吴德的一再批评，张承先及其工作组始终都是抵触甚至抵制的，最后才很不情愿地、有保留地在全校广播大会上作了一个动员检查报告。“张文”对这一过程有详细记述，兹不赘引。

按照“张文”的说法，“工作组引火烧身的行动，在全校引起很大反响”。校园里出现了许多大字报，开始了有关工作组实行一条什么路线的辩论。

5. 聂元梓是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吗？

在陈必陶等人大字报引发的辩论过程中，一些哲学系的学生征询了聂元梓的看法，随后通过大饭厅舞台上的广播（可能还有大字报）进行了传播。

对于聂元梓的讲话，特别是聂元梓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张承先及其工作组作出了很强烈的反应。据“张文”，张承先连夜召开了领导小组紧急会议。“张文”写道：“大家对聂元梓的做法非常气愤，说聂曾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工作组所有工作情况她是清楚的，处理‘六·一八事件’时她也是表示同意了，为什么又跳出来反对工作组。”

据“张文”，聂元梓“曾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现在又跳出来反对工作组，出尔反尔，那当然是不对的。“张文”说的是“曾任”，那么，聂元梓什么时候当了办公室主任？当了几天？什么时候又不当了？为什么又不当了？对此，“张文”并没有说明。这里有什么玄机吗？

《北京大学纪事》1998年版和2008年版有相同的记载：

6月10日

▲工作组领导小组研究确定：由……张德华负责办公室、资料、简报工作。办公室主任聂元梓，副主任杨克明。

6月29日 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名单（负责人）如下：

……

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主任：李芳林，副主任：任小风、刘寄久、张恩慈

组织组组长：古天佑

动态组组长：（缺）

领导小组办公室（二）负责人：蔡润田。

按照上述记载，聂元梓在6月10日~29日当过19天办公室主任，这是真的吗？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笔者先后访问过聂元梓、王茂湘和李清昆等人，王、李二人也是北大“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

聂元梓说：“我又不是工作组成员，说我是工作组办公室主任，我的办公室在哪儿？”
笔者问：“那个时间你在哪里上班呢？”她说：“我一直在哲学系总支办公室。”

王茂湘老师说：“工作组进校后，从各系抽调了十个人进入工作组。经济系是我，哲学系有李清昆，没有聂元梓。好像工作组对聂印象不大好，说她陷入两派太深。”

李清昆老师说：“工作组时期，哲学系参加校工作组的只有我，没有聂元梓。我是2号晚上，从四清前线回来。第二或第三天，通知我到工作组报到。到工作组工作的时间应当是4号或5号。在北大四清时，刘仰峤是工作队副队长，我在工作队的办公室工作。刘仰峤对我的印象不错。这次文革工作组刘仰峤也是副组长，他向张承先推荐了我。我在工作组办公室工作，在简报组。简报组有3个人，组长任小凤，是河北省委的文教部的一个处长。我们有权参加工作组核心组的会议，做记录。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是李芳林，河北省委的文教部长；副主任刘寄久，河北省文办主任，任小凤也是副主任。他们都是张承先从河北省带来的。没有听说过聂元梓是办公室主任、杨克明是副主任。说张恩慈是办公室副主任，我不清楚。”

据“张文”，工作组撤出北大后，曾到市委党校进行整训。工作组撤走时可能把工作组的档案也带走了，所以能够在档案内发现曹轶欧批发的《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的材料，他们还连续三次派代表到北京市委，要求让曹轶欧回来检查交待。那末，档案里有没有聂元梓的材料呢？当了19天“办公室主任”，不会毫无踪迹吧？但是，“张文”一点都没有提及。

笔者以为，聂元梓这个“办公室主任”，可能是“被当的”，只存在于某种文件上，聂自己并不知道，也未在“领导小组办公室”上过班。否则，拿聂元梓在“办公室主任”任内的表现说事，岂不可以大做文章？然而，这样的文章似乎并未出现。聂元梓当然出席

过张承先召集的会议，但其身份，应该是哲学系的负责人，而非“办公室主任”。同样，杨克明有没有当过“副主任”，要问杨本人，很可能杨也没有当过。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被用来打破北大这个“反动堡垒”，但聂元梓本人并未被工作组信用，不会把“办公室主任”的重任交给她。何况，张承先来北大时是带了自己的一班人马来的，“办公室主任”，当然要用自己熟悉的人。

正因为聂元梓并未当过工作组的“办公室主任”，相对超脱一些，自由一些，可以有自己的观察和看法，所以才会发表“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讲话。

“张文”用了一大段文字，把聂元梓 7.19 讲话同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陈伯达的发言联系起来，认为“不是偶然巧合，二者的关系耐人寻味”。张承先怀疑聂元梓讲话有什么来头，有这种怀疑或许可以理解，但实际上并没有根据。没有根据，又要说“二者的关系耐人寻味”，这种思维和行文方式，同《九号简报》是不是有点相似呢？

从 7 月 12 日陈必陶大字报贴出，到 7 月 19 日聂元梓发表讲话，在一周的时间里，北大同学围绕工作组问题展开了辩论。当时，认为工作组犯了“右倾”错误的大字报已经很多，聂元梓因为身份特殊，尤其在学生中有影响力，她的讲话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张文”说，“处理‘六·一八事件’时，她（聂元梓）也是表示同意了”，但没有作具体的说明。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却有一相反的说法，据该书第 31 页，张承先在 6 月 18 日晚作了讲话后，“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同意工作组的看法，聂元梓则认为‘六·一八事件’是革命行动。”但作者也没有提供这一说法的来源。

聂元梓 7.19 讲话后，工作组如临大敌，张承先在 20 日晨便赶往市委找李雪峰作了汇报。李雪峰的见识远在张承先之上，“他要工作组听取聂元梓的意见，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多做自我批评，争取主动。”张承先接受了李雪峰的意见，但留给工作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6. 关于 7.25、7.26 大会的倾向

张承先在文章中提到了 1966 年的 7.25 和 7.26 两次大会的情况。讨论那两次大会，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

7 月 16 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据当时的报道，毛泽东畅游长江的场面非常壮观，“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奋勇前进”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7 月 18 日，毛泽东回到北京。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中央上层有多次会议，对运动形势和工作组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¹ 7 月 19 日，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² 7 月 23 日，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³

7 月 24 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 月 25 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并有各大区第一书记参加的会上说：“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的，后来不赞成了。”

4

中央高层的这些事情，群众是不了解的。现在来看，事情就清楚得多了，中央文革在北大召集的 7.25、7.26 两次大会，目的就是贯彻毛泽东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主持人的倾向非常明显，辩论不过是个形式，结论是毛泽东已经定了的。

“张文”说：

7 月 25 日晚，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到北大来召开座谈会，随后又召开了有万人参加的“辩论大会”。会上的辩论很激烈，多数发言者不赞成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康生在会上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工作组是主人”，

¹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出处同前，第 35 页。

²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出处同前，第 600 页。

³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出处同前，第 601 页。

⁴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年。第 95 页。

公开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工作组的领导。支持聂元梓的人登台批判工作组：把“六·一八”革命事件打成反革命事件，把北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镇压了下去，把学校搞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他们的观点，许多同学又登台加以批驳，说“六·一八”事件的处理是正确的，工作组是“延安”，绝不是“西安”。

需要说明的是：7.25大会的主持人是江青，一些北大学生上台发言，批评工作组。台下的同学还递了许多条子，包起来有一大包。江青次日晚说把这些条子都拿回去给毛主席看了。7.25大会因下大雨没有开完，次日晚继续召开。7月26日晚的大会由康生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似乎全来了。这次大会学生发言少，主要是首长讲话，江青、康生、陈伯达、李雪峰都讲了话。

张承先对这两次大会的描述，有几处与事实不符。

首先，说多数人发言支持工作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忘掉一个基本事实：7.25大会是江青主持的，她能让保工作组的发言占上风吗？在大会上发言的人，多数是前些天江青等人来北大开座谈会时已经见过的，不是谁在现场递条子就让谁上台的。自7月12日陈必陶的大字报以来，北大关于工作组问题的辩论，已经进行了多日，形势比较明朗。工作组自己都检查了在“六·一八事件”处理上犯了严重错误。时至7月25日，已经没有几个人说“工作组好得很”了；说工作组犯了错误，有些还是严重的错误，但工作组的大方向是对的，这就算保工作组了；很多人认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北大学生中，对工作组不满是普遍的，但还没有人提出“权”的问题。辩论大会上，只有一个人发言“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此言一出，下面发出一阵嘘声。可见多数群众，当时还没有要赶走工作组的想法。

李海文提到这两次会议时写的是，“召开大会的目的，江青、康生、陈伯达说是要听取不同意见，让同学们辩论工作组的问题。但是，辩论徒有虚名，舆论一边倒。……在这种情况下，被允许上来发言的人多数都抨击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控诉学校的迫害。……这天（指26日——引者）的会议，所谓的辩论完全是讨伐工作组的罪状，大会成

为反工作组一派宣告胜利的节日。”¹

过程很清楚，张承先怎么会有“多数发言者不赞成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的印象呢？

其次，张承先说孙蓬一在大会上揭发他，这不是事实。

“张文”写道：

由于在辩论大会上未能压倒支持工作组的意见，聂元梓的积极追随者孙蓬一上台发言，抛出了一枚“重型炸弹”。他说：“我刚从中宣部了解到，张承先在天津与陆定一有秘密勾结。”当时陆定一同志已经受到了公开点名批判，把我和他拉在一起，无疑是一顶很大的政治帽子。……我沉着地走到扩音器前说明了事实真相……。听了我的说明之后，会场上很平静，没有人再追问这一问题。

孙蓬一当时被中央文革抽调去当工作人员，北大开始组建校文革筹委会时，聂元梓才把孙蓬一要回来。他怎么可能在 7.26 大会上发言呢？如果孙蓬一真的有这个发言，那只能是在后来批判工作组的时候。张承先显然记错了时间和场合。

7. “把复杂的阶级斗争搞到‘第一家庭’里来”的不是张承先

“张文”中还有一段显然是记错了的文字：

（江青）她情绪激动地高声喊道：“我揭发，张承先是个坏人。他把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来了，我的女儿李讷在历史系受到坏人的迫害，这个坏人是张承先支持的。中文系有个叫张少华的是个骗子，她自称是我的儿媳妇，根本没有这回事，我根本不承认。这个骗子也是张承先支持的。”这种“揭发”，使大家十分惊愕。会后很多师生议论，真不像话，怎么把家庭问题也扯进来了。还有的同学故意问我，“你是怎样把阶级斗争搞到主席家去的？”我只有报以苦笑，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¹ 李海文：《1966年夏北大见闻》《燕园风云录》（一）自印书，2012，第54、55、56页。

江青说的那个“把阶级斗争搞到我家里来了”的人，指的是张文秋（张少华的母亲），此张非彼张也。可能是当时张承先精神太紧张，听错了。笔者认为，江青的这段话其实是中文系学生李杨杨的讲话引起来的。7.26大会上，李杨杨作了一个肯定工作组的讲话，讲话主旨不仅和毛泽东的路线相悖，而且她宣读的她所代表的干部子弟的名单，竟然有31名之多，其中还有张少华的名字，这使江青大为光火，于是说了一大段既同家务事有关，又同当前政治斗争大局有关的话。

现在人们可以对江青和她的关于家务事的一段讲话大张挞伐，但当时是没有人敢公开说三道四的。至少，平民家庭出身的学生是不敢说什么的。“唐文”描述道，“所有人都愣了，傻了，一片寂静，谁也不敢多想，谁也不敢多说。”因为这牵涉到毛泽东和江青这个第一家庭的内部事务，江青口口声声“我们”如何如何，是把毛泽东也包括在内的，北大的大多数师生既无从了解真相，又何能判别是非，只能盲目相信了。

江青这段讲话中涉及到的与毛家有关的人物中，只有李讷还健在，其他人都不在了。笔者不想再提及已故的这些人的事，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这是毛家的家务事。但我们当初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30多年后张承先写回忆文章时，专门提到江青这段讲话。虽然他并不缺乏条件，但却没有核对一下江青当初到底是怎么说的。张承先连会上江青的讲话都没有听清楚，他又怎么能听到“会后很多师生议论”呢？

笔者以为，江青那时大发雷霆，甚至不惜在万人大会上把家庭内部的事也抖搂出来，其动因和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批判工作组、撤销工作组，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一个与毛家有特殊关系的小辈，居然站在对立派的阵营里，出现在万人大会上发表反对意见的一些人的名单里，江青怎么能容忍呢？

8. 工作组顺利撤出北大

据“张文”，在7.26大会上，李雪峰代表北京市委宣布撤销工作组。8月13日，工作组全部撤出了北大。应该说，工作组的撤离是很顺利的，并未受到阻拦。究其原因，一是暗地里被整的同学，自己还蒙在鼓里，没有人出来为难工作组。另外，刚成立的北大文革筹委会主任聂元梓的态度也起了重要作用。

1966年8月5日聂元梓有一个广播讲话。在后来的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论中，反对聂元梓的人认为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状之一就是聂元梓的8.5讲话。现在无法找到这个讲话的全文，由于反对派在批判聂元梓时引用了8.5讲话的一段，使这部分内容得以保存下来。聂元梓是这样讲的：

工作组是犯了路线错误，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作组所犯错误的责任由组长张承先和副组长张德华来承担，大多数的组员要和他们区别开来。社教中的一些老左派，在工作组时期，跟着工作组犯了一些错误，有些人在工作组问题上表现的保守。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借着清理工作组错误的机会，想把真正的革命左派一棍子打死，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必须与这种错误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筹委会号召全体北大的师生员工，要顾大体，识大局，加强团结，一致对敌，决不能斤斤计较内部分歧，而忘记了主要打击目标，使运动迷失方向，走向邪路。

张承先工作组早早撤离了北大，这是他们的幸运。否则，等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刮起，麻烦就要大得多了。张承先还提到1967年初被揪回北大，并在学生宿舍被软禁了半年之事。从张承先的回忆看，此事事出有因，并非北大故意同他过不去，也没有特别为难他。笔者当年是北大学生，从未听说此事，毫无印象，可见这件事是做得非常秘密的。如果大张旗鼓地搞，后果就很难说了。

张承先（1915.1.5—2011.1.26）是笔者师长辈级的人物，我们对他表示尊敬。他带着一项他无法完成的使命来到北大，50多天后又奉命匆匆离开北大。笔者只听过他几次广播讲话，从未近距离地见过他，在路上相遇，是不会认识的。但张承先工作组入驻北大期间的风云岁月，是我们永远难忘的。

附：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

（1966年6月18日）

今天（十八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全体工作队员正在开会的时候，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据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斗了四十多人。在这些被斗的人当中，有重点人，也有些有问题的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两个反动学生。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当时情况比较混乱。

事情发生后，工作组领导小组同志和各系工作组同志，立即赶赴现场，张承先同志在两个斗争地方讲了话，当即得到绝大多数群众支持。十一点以后，情况已缓和下来。

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带头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的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十七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姓名待查）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会议是十七日晚十时左右才决定的），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来，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同时，在斗争时出现一些可疑的现象，据工人××同志反映，在三十斋有七个未带校徽，来历不明的人，用电话到处联络，说已斗争过什么人了，现在正斗谁，到十点钟到校办公楼集合等话。还发现有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索他们想斗的人，并且把这些被斗的人拉到同一个场合，在一个所谓“斗鬼台”，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群众中煽风点火。

从几个在乱斗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也可以看出这一事件的本质：

东语系二年级学生×××（团员，家庭出身旧职员），有流氓习气，有人称他“小阿飞”。运动中不学习，不参加讨论，到处乱串，今天上午他是“斗鬼台”上的主角，专门

把斗争对象拉上台，给被斗人脸上抹黑，戴高帽子，扭打。他自认打了八人，学生反映他打了十几个，还夸耀自己是打鬼英雄，并且要流氓，摸妇女的乳房，打屁股。

庶务科一赶车工人×××，国民党员，兵痞，当过国民党上尉连长，被俘后，隐蔽反革命身份，混入革命队伍，因贪污判过徒刑，后来到北大。上次社教就表现很坏，到处煽动打击党员，这次运动中打人最凶。几次打人他都带头先下手。

无线电系六年级学生×××（党员），今天在斗争一个女干部时，撕破她的裤子，摸她的乳房和阴部。另外还在人群中乱摸两个女同学的下身。散会后已由同学把他扭送到校卫队，此人过去就有严重流氓习气，在王府井曾乱摸女人，偷东西，被逮住过，正在留察期间（已宣布立即开除党籍）。

还有个名叫×××的人，是个被开除的北大附中学生，今天拿一个一九六〇年的出入证，混入校内，到处起哄。在张承先同志讲话之后，他还在人群中高喊：“不行，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斗法！”

除了这些坏人以外，参加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本身有问题的人，怕火烧在自己身上，趁机表现自己，假装积极，抓替死鬼，乱斗乱打。政治系二年级学生（调干生）×××，在围攻聂元梓等大字报时是个急先锋，今天捣乱又最厉害，很多同学讲应该说理斗争，不要打人，他则大喊“要坚决地打，非打不行”。另一种人还是单纯从个人出气出发，不听工作组的劝告，不顾党的政策，不顾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利益。

针对上述情况，领导小组立即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

（一）下午一时召开各系工作组紧急会议。分析了上午的形势，指出这次事件与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同，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此决定抓住这件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教育群众，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辩明是非，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增加革命警惕性。

（二）以系为单位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揭露今天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会后即分组讨论。同时还强调工作队要高举革命旗帜，坚决

支持革命群众把北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三）今晚十时又召开了全体师生员工大会，由张承先同志讲话，主要表示工作组要坚定地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同时，明确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并指出这种作法会被而且已被坏人利用，指出今天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号召大家务必擦亮眼睛，不要上敌人的当。并组织全体讨论。

（四）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依靠革命的左派，组织起来，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还宣布：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按现行反革命论处。

通过以上措施，绝大多数群众热烈拥护工作组的主张，纷纷揭露并谴责了坏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如工人×××说：“工作组支持我们革命派，领导我们革命。但是有一小撮坏蛋却企图给工作组抹黑，把运动搞乱。我们决不答应，一定要把它顶回去。要和工作组一起，把这次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好”。化学系二年级许多学生，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假左派的活动情况。有些同学说：“坏人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搅浑，转移斗争目标。我们今天就是混战了一场，上了坏人的当”。许多系的广大师生在会上就高呼口号：“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评论】

究竟是谁在歪曲历史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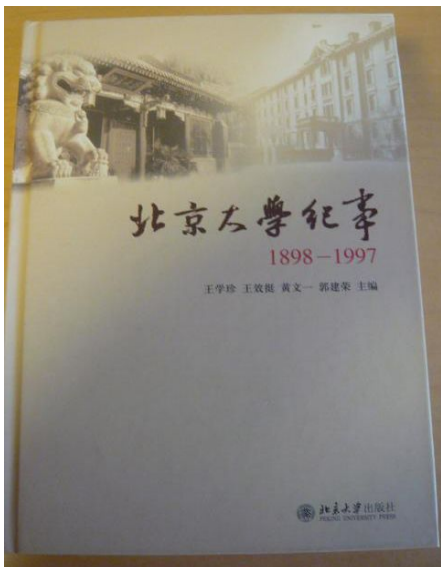
——评胡宗式对《北京大学纪事》的指责

常 风、魏 明

《记忆》143期刊登了胡宗式先生的“从三件大事的记载看《北京大学纪事》，指责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给该书扣上“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代全”，“张冠李戴”，“移花接木”，“歪曲历史真相”等大帽子。《北京大学纪事》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胡宗式对它的指责能够成立吗？

1、《北京大学纪事》是一本怎样的书？

北京大学是一座历史悠久，在国内外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学，1998年是北大建校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重要日子，北大成立了以原党委书记王学珍和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



为主编的编写小组，编写了《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该书记述了从1898年（光绪24年）起至1997年止的北京大学的百年历程。据该书前言介绍：“本书的纪事主要根据档案材料和当时报刊的报道，包括〈北京大学日刊〉、〈北大周刊〉、〈北大校刊〉等校内报刊的报道，也采访了一些校内外的有关人士，特别是有些比较重要的事情，我们均向有关人士进行专访，并根据专访的材料加以补充或校正。”“北京大学综合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刊室、北大校刊资料室和北京大学出

版社的同志对本书的编写和出版给予了很大的支持”。1998年4月，在北大百年校庆的前夕，该书作为征求意见稿内部出版发行，得到了各有关方面和校内外读者的广泛好评，认为此书不仅对了解研究北京大学的历史有很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有助于研究北京市和全国的高等教育史，同时很多读者也指出了一些错、漏之处，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希望编者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补充后再版。为此，该书的主编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和编辑范芳蕴，收集、整理了各方面的意见，进一步查阅了有关档案、报刊，访问了一些当事人，并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对一些问题进行核实研究，前后用了一年多时间进行修改补充，于2008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第2版。

《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的主编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等人都是长期在北大工作的老干部、老教师，他们接受了校领导的委托，以认真严肃的精神，利用可以查阅北大现存所有档案、资料、报刊的有利条件，精心组织编写出的这部《北京大学纪事 1898-1997》，实际上就是北大的百年校史，也是迄今为止北大唯一的官方修史，其内容全面详实，资料丰富，语言精练，不失为一部比较好的高等学校校史，是研究北大历史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当然，作为一部200多万字的鸿篇巨作，记述北大长达100年的历史，该书难免有一些错误和遗漏之处，作为北大校友，应该善意地提出具体修改补充意见，使其更加完善，而不应对其进行恶意攻击和全面否定。

对于这部记述了北大百年历史的长达1352页的巨作，胡宗式并不见得全部读过，他只是对其中记述文化革命的部分十分不满，挑出几个地方进行责问，这才真正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平心而论，该书关于文化革命的记述，只是根据当时的报刊（重点是北大校文革主编的校刊《新北大》）和《大字报选》等资料，以及有关的文件和会议记录，做了一些客观的陈述，并没有进行主观的评论。由于这些资料真实地记录了以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校文革在文化革命中犯下的累累罪行，成为她们无法否认的罪证，所以引起了至今还抱着聂元梓这个北大文革的祸首不放的某些人的不满，竭力在鸡蛋里挑骨头，企图以否定校史达到否定他们在文革中罪行的目的。

以下我们来看看胡宗式提出的几个问题是否站得住脚。

2、关于反“二月逆流”

胡宗式在其文章里，首先提出新北大公社在反“二月逆流”中的表现。现在大家知道，所谓“二月逆流”，实际上是一批老革命家（包括谭震林、陈毅、李先念、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余秋里等）对中央文革和文化革命表达的反对和抗争，而在当时，在毛泽东表态和中央文革的组织下，北京高校的群众组织也都毫无例外地卷入反对所谓“二月逆流”的行动中。胡宗式在其文章承认“3月13日，聂元梓主持红代会核心组扩大会议，第二天，红代会组织了10万人反谭震林的大游行”。但又说：“3月14日，公社总部不得不发表了一个打倒谭震林的声明，公社总部之谨慎、被动与无奈，可见一斑。”“对于新北大公社在这一浪潮中的艰难处境和对反“二月逆流”的被动消极乃至部分抵制的态度，《北京大学纪事》只字不提，这就完全歪曲了历史真相。”

究竟是谁歪曲了历史真相？请看作为北大校文革喉舌的北大校刊《新北大》是如何记载的。该报在1967年3月16日第一版的重要位置上，报道了首都红代会组织的示威游行，用的标题是《痛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发表了新北大公社声明第003号。声明开门见山



地说：“目前，全国出现了一个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新北大公社郑重声明：决心把谭震林揪出来，斗倒、斗垮。新北大公社号召全体社员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积极行动起来，与兄弟单位革命造反派并肩战斗，把谭震林打倒，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

该报还在第一版到第二版发表了《谭震林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走卒》的长篇

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给谭震林强加上了“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死保刘邓陶”、“利用大寨展览，贩卖刘邓黑货”、“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制造渔轮停港事件”、“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进行反革命复辟”五大罪状。



3月18日,《新北大》在第四版刊登了《痛击谭震林在农科院的反攻倒算——记 66.11-67.3 农科院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提出“打倒谭震林,解放全农口”的口号。

1967年3月25日,《新北大》在第一版发表了本刊编辑部的长篇文章《不平常的春天——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第二版上发表了“反复辟战斗队”的文章《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表现种种》,在第四版上刊登了长篇文章《打倒谭震林》。



在短短的10天内,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喉舌就刊登了多篇反“二月逆流”,攻击和打倒谭震林的报道

和评论文章,还派人到农科院等单位收集谭震林的所谓罪行,他们的表现是多么大胆、主动和积极,哪有什么“谨慎”、“被动”和“消极”、“无奈”?他们的所谓“艰难处境”和“部分抵制”,又到哪里去找到依据呢?《北京大学纪事》根据当时的报刊资料,记录了当时聂元梓和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的表现,又何错之有?有什么可以值得指责的呢?

3、所谓“聂元梓、孙蓬一揭发关锋、王力接党营私， 发起了反吴传启的行动”

胡宗式在文章里说：“在“一月夺权”和反“二月逆流”的过程中，以聂元梓、孙蓬一为代表的北大人，逐渐看到了关锋、王力、吴传启等人结党营私的丑恶勾当”。又说：“以聂元梓、孙蓬一为代表的北大人坚持自己的信念，他们没有被权威吓倒，也没有被合作之类的利益诱惑。”

这里，我们要严肃地指出，聂元梓、孙蓬一在文化革命中一度篡夺了北大的权力，但是他们不能代表北大人，北大广大师生员工也不承认他们能够代表北大人，相反，北大人以北大出现聂元梓、孙蓬一这样的败类感到耻辱。聂、孙能够代表的只是他自己和少数拥护他们的人（例如胡宗式）。

下面我们看看聂元梓在“一月夺权”中的表现吧：

1967年1月，“夺权”风暴从上海开始，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支持下，先是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之后，在山西、黑龙江、贵州、山东等省，造反派和部分支持他们的“革命”干部联合起来，进行了夺权行动，并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北京，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造反派“领袖”当然也不甘落后，纷纷行动起来，把夺权的手伸向了北京市。

时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聂元梓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1966年11月19日至12月16日到上海串联和煽风点火，回来后向江青、陈伯达做了汇报。1月16日江青、陈伯达召见了聂元梓和她的助手孙蓬一。1967年1月17日，聂元梓根据陈伯达、江青的授意，组成了“夺权指挥部”，孙蓬一、徐运朴任夺权指挥部指挥。1月18日聂元梓召开北大各单位文革主任联席会议，提出“要立即组织人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和北京市委各部夺权。要赶快行动，去晚了就不成了”。会后连夜出动大批人到中

央各部和北京市夺权。1月20日,《新北大》刊登了聂元梓的署名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万岁”。¹

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毛主席号召,让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中央的文件和报纸上也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我必须紧跟啊!我就到地质学院去找王大宾,正好蒯大富也在那里,还有其他学校和单位的人也在,大家就商量如何联合起来夺权。当时,上海夺权以后成立的机构,开始不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而是叫做“上海人民公社”。我和王大宾、蒯大富商量,成立一个“北京公社”(全名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为夺权做准备。说着说着,他们就都跑了,他们都不理睬我,就剩下我自己了。

.....我们已经联络起来一批工厂、机关、学校的群众组织,就决定在广播事业局大楼设一个点,一个联络站。广播事业局大楼在复兴门外大街上,地点适中,便于全市四面八方的人们来往联络。²

聂元梓在广播事业局设联络点,除了这里的地点适中外,还因为那时的电视还不普及,广播电台发挥着重大作用,还有那里有一位著名的国际造反派组织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头头美国人李敦白,文革中的影响很大。

蒯大富回忆说:“对北京夺权我不太关心。韩爱晶那里我只派个人去参与而已。聂元梓找我的时候我心里特反感,整个北京学生反工作组的时候你在哪里呢,怎么听不到你一点声音,现在看见上海夺权了你也想夺权了,肯定是想当北京市长,我现在都这么说她。”

3

1967年1月27日,北京大学校文革(那时还没有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和中国科学院、广播事业局的造反派组织以及第一机床厂、第二机床厂、石景山发电厂、新华印刷厂等20多个工厂的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出了《北京革命造

¹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771页。

² 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版,第195-196页。

³ 许爱晶编著,《清华蒯大富》,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版,第198页。



反公社倡议书》，倡议书中写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就是要说，就是要干，干它个天翻地覆，把旧世界砸它个稀巴烂，把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彻底斗倒、斗臭、斗垮，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把他们长期霸占的党权、政权、财权、大权、小权统统夺过来，夺它个一干二净，统统归于人民！”倡议书还若有所指地写道：“搞小团体主义、宗派主义、个人风头主义来抢权吗？不成！想‘下山摘桃’窃权吗？不成！搞阶级调和、

大杂烩式的夺权吗？也不成！打着造反旗号，搞名夺实保的假夺权吗？更不成！”倡议书提议：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全面夺取北京市的领导权！¹

2月5日，地院东方红总部表声明，退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据该部负责人讲，是因为已参加了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处，没有必要再参加另外一摊子。他们认为，聂元梓、蒯大富的作法有山头主义、风头主义，还表示对“夺权斗争委员会”不了解。他们主张大联合，先按系统联合。²

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对聂元梓等人提出的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行动并没有表示承认和支持，而是派了身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谢富治来主持北京市革委会的筹备和建立。据《首都红卫兵》2月18日报导：谢富治副总理亲自抓北京市的大联合，大夺权。他于1967年2月6日下午，接见三个司令部的工作人员，表示支持三个司令部联合，成立“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指出，目前在大联合中，学生各组织互相吞并不是不对的，应该联合。大联合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到了2月9日，他又在讲话中指出：北京市的大联合道路是：工人搞工人，学生搞学生，农民搞农民，然后大联合。他在谈到夺

¹ 北京大学校刊《新北大》，1967年1月28日第二版。

² 聂树人著，《三司与首都红卫兵》，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版，第263页。

权问题时说，主席强调夺权必须实行三结合，否则中央不承认。¹

1967年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成立，聂元梓任核心组组长，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任副组长。之后，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简称农代会）、革命职工代表大会（简称工代会）和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相继召开。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谢富治为主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为副主任，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都当上了常委。

以上就是聂元梓等人在一月夺权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她极力想利用“第一张大字报”作者的金字招牌，抢夺北京市的大权，在夺权过程中和其他造反派组织既有联合也有争斗。聂元梓和吴传启等人的矛盾，也是在这个争权夺利过程中产生的。

至于聂孙在反“二月逆流”中的表现，前文已经叙述，也看不出他们与关锋、王力有什么斗争和不同。

胡宗式文章中说：“4月10日，聂元梓和孙蓬一去钓鱼台，向陈伯达、江青当面陈述了对关、王一伙的意见。此事详情当时没有传达过。多年后，笔者才从孙蓬一1977年1月3日的来信中获知这件事情的经过。”既然此事详情当时没有传达过，胡宗式也是多年后才从孙蓬一的来信中获知这件事情的经过，在北大现有的报刊和档案中也都没有记载，怎么能够要求《北京大学纪事》写出聂孙和关锋、王力“斗争”的内容呢？再说，聂元梓和孙蓬一向陈伯达、江青陈述对关锋、王力的意见，也不代表他们就是和关、王进行斗争；而他和吴传启之间的矛盾，顶多就是文革中不同派别、不同组织之间的矛盾，也不能代表他们就是正确的。胡宗式把聂孙与潘吴之间的斗争看成一件了不得的大事，而在当时知道他们之间斗争的人在北大也只是少数人，即使到现在，有很多北大校友，都没有听说过潘吴是何许人，可见他们与潘吴之间的斗争，实在不值一提。胡宗式在这个问题上小题大做，不过是为了给聂孙表功，而《北京大学纪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多费笔墨，也是很正常的。

¹ 《首都红卫兵》报，1967年2月18日。

4、关于孙蓬一1967年4月12日讲话

引发的“炮打谢富治”事件和“抓叛徒”问题

1967年初，聂元梓、孙蓬一在北京市到处夺权，手伸的很长，不可避免地和其他群众组织发生冲突，民族宫事件就是北京两大派组织发生冲突的一个焦点，尤其是新北大公社和地院东方红，在这一事件中矛盾更加表面化。4月12日晚上，校文革在大饭厅召集大会，参加人数很多，气氛十分火爆，笔者也在现场听到了孙蓬一声嘶力竭的讲话，他在说到当前形势时如临大敌，认为有人要推翻他们这个“红色政权”，矛头直接指向了地院东方红等组织，也暗示地院的后边有人支持，在他的非常具有煽动性的讲话后，部分群众走出校门游行，并贴出了针对谢富治的大标语。

聂元梓到底老谋深算，知道不能公开反对谢富治，否则会给自己带来被动不利的局面，赶快派人阻止，劝回了游行队伍，覆盖了大标语。胡宗式也承认：“孙蓬一的4.12讲话可能非常鲁莽，策略上很不妥当”。

4月13日《新北大》第一版及时刊登了孙蓬一的讲话，把这个大会说成是“万人誓师大会”，把孙蓬一对地院东方红和所谓“摘桃派”的斗争和反“资产阶级逆流”联系起来。

4月1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在人大大会堂接见首都红代会代表，对聂元



梓、孙蓬一的行为和“摘桃子”的理论进行了批评。¹胡宗式文章中写到：“就是在4月14日，康生给聂元梓写了一封关于抓叛徒的信，同时发生的事，《北京大学纪事》专挑这一件事来写，不敢涉及会议的其他内容。”

¹ 见《记忆》143期，68-77页。

胡文说：

这里只谈三点：

第一，鼓励红卫兵抓叛徒，是党中央的行为。

历史上，至少从1927年开始，党中央就时刻注意叛徒、特务问题。文化大革命更是如此。毛泽东在1967年2月20日批示：“阅谭震林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等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情况和出现问题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的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名义加了按语，影响极大。

第二，1967年9月16日，在大会堂，召开中央首长接见天派的会议。在这次会上，总理有这样的讲话：“揪叛徒问题，“天派”“地派”都合作了，这个行动完全有利于党的纯洁”。总理这句话编者看不到吗？非也。《北京大学纪事》的编者，是仔细研究过这一篇讲话的。从诸多事件中，他们只书写了这样一条：9月16日江青讲话说，“北大是老保翻天，至少是部分老保翻天”。总理的话显然不合编者之意，就不选录了。

第三，北大抓叛徒的行动，有总理的亲笔批示，也有康生的指示，并且，总理的批示在前（4月3日），康生的指示在后（4月14日），《北京大学纪事》只提康生的指示，不提总理的批示，这是对历史正确的态度吗？

我们要指出，胡文在这里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

首先，依然对文革中“抓叛徒”的行为进行肯定。我们知道，文革中的所谓“抓叛徒”，实际上是康生和四人帮以“抓叛徒”为名，打击刘少奇和迫害大批革命干部的行为，最典型的就是所谓“61人叛徒集团”事件，康生明明知道这个事件的真相，却在文革中提出来，

致使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被捕入狱，成为文革中的大冤案。这个冤案在粉碎四人帮后，由胡耀邦勇敢地提出来，在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陈云等的支持下，得到了平反。胡宗式在这里把责任推给党中央，却不揭露康生的险恶用心，不否定“抓叛徒”事件的错误，不承认聂元梓等人受到康生的利用，他的思想显然还停留在文革“抓叛徒”时期，对这一事件完全没有新的认识。

其次，企图搞“错误人人有份”，把水搅混，把总理和康生放到同样的地位上。我们知道，康生在历史上一贯极“左”，以“整人专家”著称，在延安整风期间，就大搞整人，制造许多冤案，在文革中又与“四人帮”勾结，干了许多坏事。而总理在文革中忍辱负重，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了许多老干部、民主人士和科学家。当然，人无完人，总理也犯过一些错误，但他的错误和康生不是一个性质的。胡宗式在这里把总理和康生在“抓叛徒”的问题上混在一起，企图搞“错误人人有份”，要求把周总理对“抓叛徒”的批示和讲话写入北大校史，否则就是“歪曲历史真相”，请问胡宗式的居心何在？

胡宗式文章的最后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总结文革，首先是真实的文化。按《北京大学纪事》提供的材料来总结北大的文革，只会走入歧途。”

胡宗式作为当年北大校文革动态组组长，能够参加校文革的会议，甚至陪同聂元梓参加中央文革领导的接见，毕业后又被军宣队当作“516怀疑对象”进行过“清查”，他对北大文革情况的了解，应该比常人多一些，如果他能够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料，写出北大文革的真实情况，并进行认真的反思，总结出历史的教训，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但遗憾的是，由于他对文革和北大文革的代表人物聂元梓、孙蓬一缺乏正确认识，尤其对北大文革缺乏宏观认识，总是企图利用一些枝节问题为聂、孙辩护甚至表功，以偏代全，对全面记载北大文革事实的《北京大学纪事》进行指责和攻击，其立场和思想方法都是错误的，他自己才是真正的偏见者。如果读者按照胡宗式的偏见来总结北大文革，那才会走入歧途。■

【述 往】

纪念李其琛

俞小平



姓名：李其琛

性别：男

籍贯：广东梅县

职业：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讲师

生日：1934 年 6 月

忌日：1968 年 12 月 8 日¹

在他生前，我不认识这个人，不知道他是谁，可是在他死难的那一天见过他，就在他的灵魂离开他的身体的时候。

2013 年 10 月 18 日，我们北大技术物理系放射化学专业 1963 级的同学欢聚一堂，我见到了毕业后 43 年来未曾见过的夏健祥同学。昔日毕业时，我等尚为青年学生；如今再见日，已是年近古稀老人。然而相谈数言，即觉相知如故，实属不易。相互问候这些年的生活、工作之后，我向他提起一个 44 年来挂念在心的事。

为了不干扰在场其他同学的谈话，我小声对他说：你记得 1968 年 12 月，你在 42 楼水房目击的 43 楼跳楼事件吗？

他略显惊异地看着我：我记得，这事怎么能忘掉？那是一个地球物理系的青年教师吧？

我想是的，但是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你能查到吗？

我想能的，我回去后可以上网查。

¹ 《李其琛纪念馆》(liqichen.netor.com)

你查到后请告诉我。这些年我一直未能忘却。

回到美国家中，我开始我的工作。首先我上网查询了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

她在该书首页的献词说：

“仅以此书献给所有的文革受难者

愿你们的惨剧，

不再被隐瞒、忽视或遗忘，

而成为永远的警示：

抵制一切暴行，

尤其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群体性迫害。”

在该书第 344 页“李其琛”条，王友琴记录了以下内容：

李其琛，男，1934 年生，广东梅县人，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讲师，1952 年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68 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指控为“反革命小集团”成员，被“隔离审查”，遭到毒打和侮辱，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重摧残，1968 年 12 月 8 日自杀身亡。时年 34 岁。¹

我的一个好友，原井冈山兵团“万岁纵”乐队的小提琴手，²是地球物理系 1963 级同学，在 1968 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中也是备受折磨。我向他咨询该事件的详情，他回邮说不能谈论此事，回忆过去太痛苦了。他只是说，是他们系的“那些王八蛋”把李其琛逼死的。他说到这样地步，我也就只好放弃了。

¹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和杀戮的寻访实录》，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 年版
(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12/victim_ebook_070505.pdf)

² “万岁纵”的全称为“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纵队”，简称“万岁纵”。文革期间的北大分裂为两大派：“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新北大公社下属单位为“团”，以各系的顺序编号为名，比如中文系编号 5 系，中文系的新北大公社组织就叫“红五战斗团”。井冈山兵团下属单位为“纵队”，中文系的井冈山组织就叫“五纵”。井冈山企图以“纵队”大于“团”在声势上压新北大公社一头。“万岁纵”编有合唱队、乐队、舞蹈队、后勤组等，是井冈山兵团的文艺宣传机构，是跨系的组织。新北大公社也有相应机构，叫做“新北大公社‘毛泽东思想万岁’战斗团”。

依靠这些信息，我在网上查到了更多的有关资料。有一个“李其琛纪念馆”，是李家人在网上开办的。纪念馆里资料丰富，有北大为他平反的讣告、悼词、他的中学校友的纪念文章、他历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其中北大地球物理系在1978年9月28日为李其琛举行的追悼会上的悼词催人泪下：

悼词¹

李其琛同志含冤九泉之下已近十年了。今天，我们在这里沉痛追悼他，以寄托我们对他的哀思。

李其琛同志一九三四年生于广东梅县，一九五二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留校工作，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青年教师。他所任教的专业课是教学效果最好的课程之一；他所写的讲义，十几年过去了，至今仍是国内所独有。李其琛同志又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科学工作者，他首先将相干散射引入雷达气象方程，并对其作了理论分析，因此受到国内外科学界的好评和重视，他的科学论文“雨和云的相干散射与雷达气象方程”在《中国科学》发表后，美国和日本曾先后作了相干散射的实验，以验证李其琛同志所提出的效应，并于一九六六年在《美国雷达气象会议文集》上发表。日本学者还多次来信，表示愿与他们称之为教授的李其琛同志共同研讨的愿望。国外科学工作者并不知道李其琛同志的悲惨结局，直到一九七四年美国气象学会访华团来访后，美国气象学会主席阿特拉斯才正式向世界披露了李其琛同志已经死去的消息。

李其琛同志虽然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但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积极要求进步，认真改造世界观。早在中学时期，他就担任团总支书记的工作。五二年考入北大物理系后，李其琛同志不考虑个人得失，积极响应党的召唤，毅然放弃自己所渴望的理论物理专业的志愿，自愿进入了气象专修科。李其琛同志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六四年在农村“四清”中，他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受到工作

¹ 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李其琛同志悼词》（article.nector.com/article/memtext_99633.html）

队的好评。在文化革命前曾任地球物理系工会副主席，勤勤恳恳为大家服务，受到群众的赞扬。李其琛同志勤奋努力谦虚谨慎，对同志诚恳热情，许多青年教师和实验员都受过他的热情帮助和指导，至今铭志不忘。

李其琛同志是一位好同志，一位有希望的科学工作者，他一生光明磊落，正直不阿，谨慎小心，但是他却没有逃脱林彪、“四人帮”一伙罪恶的魔掌。一九六八年北大清队扩大化期间，在地球物理系制造了一桩骇人听闻的所谓“桥牌俱乐部”冤案，一批同志横遭迫害，李其琛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李其琛同志被非法关押监禁，在私设的刑堂上严刑逼供，受尽了肉体上的折磨、精神上的摧残和人格上的污辱，于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八日含冤含恨死去，其时年仅三十四岁。我们对失去一位诚实的同志而感动悲痛，对失去一名在科学上有才华的人而感到惋惜。李其琛同志是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的直接受害者，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他的死，是对他们的血的控诉。

李其琛同志以死作了他的最后反抗后，迫害和诬陷并没有结束，当天，就被戴上“死不悔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以后王连龙等人追随“四人帮”，置广大群众的正义呼声不顾，拒不给李其琛同志平反，致使李其琛同志一直含冤九泉之下，也使他的遥居广州的亲人背着反革命家属的沉重包袱屈辱地生活了十年。

今天“四人帮”终于被打倒，李其琛同志的冤案也终于得到彻底平反和昭雪，在我们大家沉痛哀悼李其琛同志的今天，想李其琛同志可以瞑目九泉了。

李其琛同志，安息吧！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李其琛的两位中学校友在悼念他的文章里说：

1969年世界气象学会年会向李其琛发出邀请函：“只要李其琛教授能出席我们的大会，和我们见个面，就是我们的光荣。”足见李其琛在世界气象学界的崇高地位及其理论

是受到何等的重视。1972年，日本再版李其琛的论文，有关学者来函，冀与李其琛“教授”共同研讨有关理论。谁知，他们所敬重的李其琛“教授”早在1968年已含恨离开了人间。

直到1972年，美国气象学会访华团回国后，在《美国气象公报》上发表的该学会主席阿特拉斯的访华报告中，特别向全世界气象学界正式宣告：知名的李其琛“教授”已经逝世，对此深表痛惜！¹

其琛不但是一位了不起、不可多得的人才。在我们心中，他是我们的榜样，是天才。他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他忠心耿耿，为祖国的科学献身。难以置信的是在“四人帮”横行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他却受尽了折磨，直到被残害致死。他曾被打成“白专典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包庇重用的坏人”。更有甚者，1968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大学大搞“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四人帮”在北京大学的爪牙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桥牌俱乐部”冤案。其琛竟被打成“反革命”。他们通过拷打，指控等卑劣手段，无耻地制造谣言，说什么“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在桥牌桌上，以牌为比喻攻击中央首长”。把一批北大的教师打成“现行反革命”。许多年后，有人告诉我，当时揭发其琛最“上纲”的一条“罪状”是有一次其琛在出牌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打老佛爷！”。仅此一句，就被定为攻击“旗手”江青的滔天大罪。其琛受到残酷毒打和辱骂，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严重的摧残。他本来白皙清瘦的脸，竟被折磨得发黑发青，肿得连最熟悉他的人都认不出他来了。他精神完全崩溃，走路时曾不由自主地撞到墙上。1968年12月的一天，他又一次被毒打。就在这一天，他被迫从楼顶跳下，含恨死去。

更令人发指的是，“四人帮”的爪牙当天召开群众大会，对着其琛的尸体，批斗死者，宣布给死者戴上“死不悔改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直到1978年，也就是他去世十年后，才得平反昭雪。他远在广州的妻子、女儿和其他的亲属，戴着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帽子，屈辱地生活了十年。

¹ 杨清浩：《难容天才的时代》（article.nector.com/article/memtext_99632.html）

1979 年我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回到广州暨南大工作。见到了其琛的夫人李婉华和爱女李珩。婉华也是梅州第一中学的校友，比我们低三级。自 1952 年分别后我们一直没有联系。重逢时，她详细告诉我其琛和他们一家悲惨的遭遇，并把一份北京大学 1979 年 10 月登载“十年沉冤得昭雪”的悼文的校刊交给了我。满腔悲愤，无法形容。¹

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时这些文件都把迫害李其琛的罪魁祸首指向林彪、四人帮，而放过了真正的文革暴行的始作俑者。奉旨进驻北大，迫害北大师生的工宣队，连同悼词中提到的 8341 部队政治部副主任王连龙，直接受文革元凶的指挥，岂是林彪、四人帮之类能管得了的？那些桥牌桌上心怀恶意的告密者和专案组里凶残狠毒的打手，即使他们逃脱了法律惩罚，仍然各有各的良心账要算的。

下面是我亲眼目睹的李其琛被自杀现场：

1968 年 12 月 8 日，星期日，一个晴朗的冬日。在一周枯燥、紧张的例行运动之后，我们有一天可以休息，放松自己。我的同学夏健祥睡到 9 点钟才起床，从我们居住的 41 楼到水房去洗漱。我们的水房位于 42 楼，面临 43 楼的侧面，在 43 楼的顶端是该楼的文艺室，那是每层楼用来开会的大房间。文艺室外是个阳台，一楼的阳台要更大一些。夏健祥一边刷牙，一边抬头看着窗外时，他看见一个人正从文艺室笔直落下！他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眼看着那人“呼”地一声，头颅已经撞在一楼外面的坚硬的水泥地上。夏健祥拔出牙刷大叫：“有人跳楼！”那时北大正在工宣队的淫威下搞“清理阶级运动”，大家的精神高度紧张，不知道厄运什么时候会落到谁的头上，校内三天两头有人自杀。夏健祥一边大叫，一边冲过楼道，冲下楼梯，同学们闻声纷纷冲出寝室，跟在他后面跑出 41 楼，绕过楼侧的小道，冲向跳楼者坠落的水泥平台。当大家越跑离死者越近时，都放慢了脚步，走到十几米开外，便停了下来，上百人静静地看着死者。死者头朝下俯伏在坚硬冰冷的水泥地面，鲜血从头颅喷涌而出，在水泥地上漫流开来，在冬日的阳光下冒着热气。他的腿抽动了几下，停止了生命的最后挣扎。这是谁呀？为什么要自杀？63 军军

¹ 吴恭顺：《永不忘却的纪念》（article.netor.com/article/memtext_99639.html）

宣队的头头带着几个军人赶来，板着脸，朝着四周的同学们扫了一眼说：“把他翻过来！”你叫我们把他翻过来？军头的目光所到之处，同学们纷纷后退，谁也不肯去做这样的事。军头没辙，叫手下的一个军人去干。那军人把死者翻过来。我看到，死者半边脸着地被撞扁，头颅破裂，鲜血与脑浆仍在不断涌出。我在本文开头所说的见过他，就是在这个悲惨的瞬间，当他的冤魂正在离开他的身体的时候。现场没有人指认，不久一辆小卡车载走了他，大家散去。下午消息传来，死者是地球物理系的教师。他受不了无休止的折磨，趁着监管人员疏忽的当口，从他所在的39楼跑出来，冲上43楼五楼，冲出文艺室后决心就死，头朝下跳下五楼。他达到了他的目的，再也不会受折磨了。这一天我的情绪都很坏，我想找我的地球物理系的好友打听，但是他也是审查对象，也失去了自由。

下一年，当63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当时“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北大的掌门人，为工宣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的所犯错误，在东操场向全校师生员工宣读检查报告。我们都觉得很解气。可是再解气，全校30多个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自杀的死者还是回不来了。副校长翦伯赞夫妇是这样，化学系同学李人杰是这样，地球物理系讲师李其琛也是这样。

如今李其琛已经故去46年。他要是还活着，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会对大气物理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世界气象学会没有忘记他。

我们，北大校友，也没有忘记他。

在他生前，我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谁。由于目睹他的死，我才决心去追索他的悲剧。

愿他的灵魂在没有阶级斗争的天堂里安息。■

【述 往】

北大工军宣队领导下的清理阶级队伍

——翦伯赞是怎样自杀的

王复兴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宣告了红卫兵运动的结束。毛泽东指示工人阶级开进上层建筑领域。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先后占领了清华、北大。

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工军宣队立即夺了校文革的全部权力，掌控了北大。工军宣队总指挥是63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副总指挥是魏秀如（女、二机床工人）等6名工人。派到我们历史系的负责人是李杰（618军工厂工人）。8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说大部分知识分子仍没有改造好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上层建筑领域“要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此后，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说法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在地、富、反、坏、右、叛、特、走资派之后，知识分子排第九位，是老九，包括大专院校师生，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边缘人物。

9月下旬，在工军宣队领导下，北大开始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在宣传队提出的“北大王八多得腿蹬腿”的思想指导下，全校相继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超过当时全校师生总数的10%。¹

10月16日，在清队中，对物理系一级教授、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的历史进行审查，有人揪斗，有人贴大字报。16日晚饶毓泰上吊身亡、时年77岁。²

¹ 《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相关日期条目。

² 同上。

10月17日，原北大党委常委、教务长、校文革常委崔雄崑，16日晚从清队集中地28楼出走，17日晨被发现在校内红湖游泳池投水身亡。时年49岁。¹

10月18日，数学力学系教授董铁宝在清队中被立案审查，被诬陷为“美国特嫌”，进行逼供，上吊身亡。时年52岁。²

11月4日，笔者所在历史系原系党总支委员、系文革主任吴维能，因被点名批斗是陆平的黑班底投河身亡。³以上是《北京大学纪事》所记载的吴之死因。但在我的记忆中，吴维能在清队中是因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问题而被审查、批斗，在圆明园投湖自尽。时年41岁。

吴维能出身小八路，历史系毕业后留校，1957年时任系团总支书记、系总支委员、系办公室主任。1959年家乡有人饿死，父亲告诉他“没饭吃”，他说了出去，为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食堂干活。文革一爆发，他马上造反成为历史系文革主任、校文革委员。工宣队进校清队，翻老帐，追查他1959年右倾机会主义问题，终没能逃过59年之劫。

11月16日，北大校医院副院长郭淑贤大夫，于15日被打成“反动小集团”头头，对其批斗，审问逼供。16日晨用刀片自刎身亡。时年49岁。

12月10日，西语系党总支委员、系持办公室主任徐月如（女），清队中被批斗是“陆平的黑班底”，“攻击三面红旗”，工宣队对其日夜轮番批斗、逼供，并威胁要游街批斗。10日，徐上吊身亡。时年39岁。⁴

以上仅列举了北大工宣队在清队的首三个月，审查、逼供、批斗知名教授及系总支委员以上干部这一层级，导至自杀的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事例。在首三个月的清队中，另有五位讲师自杀，分别是物理系的廖莹、俄语系的龚维泰、东语系的汤家瀚、数力系的陈永和、张景昭（女）。⁵

¹ 同上。

² 同上。

³ 《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相关日期条目。

⁴ 《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相关日期条目。

⁵ 《北京大学纪事》2008年版相关日期条目。

笔者所在历史系，清队中工宣队对副系主任张芝联教授进行了立案审查。历史系的清队由 618 军工厂工人李杰负责，他同时是历史系的一号领导。李杰瘦高个，能说会道。1969 年初，李杰突然被解除历史系的领导职务，随后得知是因其利用清队、审查之便，向被审查的张芝联教授借钱，这种钱大约是不会还的。钱是“借”到了，但是被告发了。不久传出李杰自杀的消息。权力腐蚀人的效应，来得如此之快。

12 月 12 日，工宣队上报的《简报》称：“自清理阶段队伍以来，北来自杀了 17 人。”这是到 1968 年 12 月 12 日为止的自杀人数。¹北大工军宣队的“清队”扩大化一直延续到 1969 年 3 月底。1969 年 3 月底中央警卫团 8341 部队进驻北大，扩大化的清队工作才告一段落。而后北大进入第二次清队。第二次清队是在 8341 领导下进行，强调各项政策，严禁逼、供、信。

文革期间（1966 年至 1976 年），北大非正常死亡 63 人，工军宣队期间死亡 38 人，占文革非正常死亡总数的 60.3%。非正常死亡包括：自杀、折磨至死、武斗死亡。数字表明，文革期间，北大工军宣队对知识分子开展的阶级斗争，最残酷、最血腥。²

北大清队中的自杀风潮之高峰，是 12 月 18 日翦伯赞夫妇自杀。

翦伯赞是笔者所在的历史系主任、是著名历史学家、一级教授、北大副校长。1968 年 10 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指示，“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要照顾翦伯赞的生活，安排他的工作。”然而，在 1968 年 12 月 18 日晚翦伯赞与夫人戴淑婉却在家中服安眠药自杀身亡了。翦伯赞的自杀事件是北大文革史也是整个文革史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他是怎样自杀的？各种版本众说纷纭。许多传说漏洞百出。我的历史系同班同学王渊涛是此事件最直接的知情人。他是在翦自杀前被历史系工宣队委派，临时配合中央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工作。王渊涛当时是从历史系大批判组临时抽调过去的。他近距离接触、观察了翦先生最后的时日。

¹ 《北京大学纪事》2008 年版相关日期条目。

²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 2011 年第一次印刷。

据王渊涛校友向我讲述，1968年11月22日，中央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到北大，到北大的专案组人员是巫中。而后专案组的巫中多次到北大提审翦伯赞，追查翦在1935年至1936中共地下党与国民党谈判国共合作中，与刘少奇的关系。目的是给刘少奇“叛徒”、“内奸”罪名增加定罪定性材料。文革中此段历史，是被中央刘王专案组视为重大政治历史问题来审查有关人员的。这给翦造成了极其巨大的压力。在8月18日下午的最后审问中，巫中从揭翦伯赞的隐私入手（当年国共谈判期间，翦与一年轻女子谌小岑、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这女子正是国民党中央特务负责人陈立夫密令属下曾养甫派出的。）追查翦在国共谈判中的变节行为。这成了对翦至命的最后一击。翦伯赞当晚与夫人双双服用大量安眠药自尽。翦伯赞先生自杀去世的时间是1968年12月18日，正值北大第一次清队的高潮时刻。■

【资 料】

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同志 在同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单位的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晚至十一日）

陈伯达同志讲话

有些问题准备跟大家商量一下，请大家考虑一下，我们有些看法，不知是否妥当。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以来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极其辉煌的胜利。这个胜利震动了世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新的一次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中国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毛主席群众路线的胜利。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全国的形势，全国革命群众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对这个形势怎么看？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胜利的道路上前进。形势大好。当然是波浪式前进的，不但全国是这样，北京也是这样。

现在有一个偏向，就是到处串的多，学习较少。用毛泽东思想不断总结经验少。一些同志对于总结经验兴趣比较小。进行这样伟大的斗争，不总结经验就不能提高。一些同志也讲要当毛主席的小学生，但实际行动学习毛主席著作、当毛主席的小学生较差。就是说，怎样学习毛主席思想，根据毛主席思想总结经验，对这些问题考虑的少。但要压倒旁的派别比较多，相互学习、相互帮助较少。对不对？

关于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毛主席说：知识分子不与群众相结合便一事无成。关于如

何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一些同志未很好研究。有一个时期说结合，都到工厂去，去的人很多，大人小孩一大堆，工人没有工作做了，影响工人工作。一些同志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还有个情况，你们下去，不是当小学生，而是当先生，把你们派别的观点都带下去了，把派别的观点都带到工人、农民里去了。不是跟工人农民学习，而是搞派别观点，搞分裂。当然，你们有很多人到工人、农民里面去，起了很好的作用。你们到工人、农民里面去，应当先当学生，不是当先生，这样就不会把派别斗争带到工人里面去。如果影响生产，那就不好了。你们到各地串联，有很大成绩，发动了革命派，革命小将，并且你们回到北京向中央反映了很多情况，中央不知道的情况。但是不能总去这样搞，因为这样容易片面，走到另一个极端。好像全国文化大革命要由北京的人包办代替。

现在北京又坐不下来了，又发起大串联的号召，有些人要上火车，要出去大串联。你们不跟谢副总理商量就去搞大串联。有些人说我们中央文革号召出去串联。我们中央文革没有号召出去大串联。你们说有，我们说没有。

《红旗》杂志社论是根据武汉地区情况写的，可是你们不作具体分析，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有一种理论，说军队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这种看法和中央的看法不一致。我们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光辉胜利，你们说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夕，你们个别派别有这样一种估计，这样估计对不对？是你们估计的对，还是中央估计的对？如果现在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夜，那么不是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吗？这样的话，不把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的成绩都否定了吗？这样与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是相反了。如果是这样，你们一年多的工作不是作废了吗？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因为有这个错误估计，所以思想彷徨，行动彷徨，今天想这样，明天想那样，出去搞包办代替，好像那里没有北京的学生，就不得了了。我以前说过，现在也这样说，你们去年出去，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的作用，再这样下去，想包办代替，就会走向反面了。有这么个说法，不知对不对，提出来你们注意，说全国有些地方两大派争论不休，有原则的争论我是赞成的，这里说的是无原则的争论，都跟北京的学生有关。少数人想包办代替全国或某个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想法是不对头的，是

与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相违背的。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同学们去年出去煽风点火，起了好的作用，以后，有的想包办代替，就起不好的作用了。

有的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够，掌握毛泽东思想不够，不会用毛泽东思想分析、处理问题，在某些地方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如武汉问题，中央作了很适当的正确估计，经过毛主席批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大家都看到了，信上面讲：“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遵循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指导的轨道上前进。”“武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但是，有些同学估计说，武汉问题表面上解决了，目前的平静是不平常的，是反革命复辟的前夜，正在酝酿着一场更大规模的反革命叛乱的危险。与中央的估计不一样。到底是这个估计对，还是中央的估计对？应当信任曾思玉同志和刘丰同志，他们是中央派到武汉去的，是中央信任的。武汉的革命派应当很好地跟他们合作，北京的同学不要去造他们的反。

我曾经同有的同学交谈过，你们在北京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在你们的学校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都是很艰苦的工作，大批判、与工农相结合、本单位的斗批改，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但你们坐不下来。当然，有的事做了，做得不错，小报上有些批判文章写得很好，但还可以再提高一步。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大革命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开出更灿烂的花朵来。你们的花，思想上的花，我看还开得不够旺盛。

有这么个口号，叫“内战外打”，不知有没有？这个口号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叫“5.16”（红卫兵团）的秘密组织，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着周总理，实际上对着中央，对着周总理也是对着中央，你们知道吗？能不能批判？（众说：打倒！）打倒！你们要给他们警告，要他们不要犯这种错误。

毛主席说，我们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大多数，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相信和依靠

人民解放军。这是我们应当遵循的正确轨道。我们不要被敌人利用，不要受坏人挑拨。我以前对一些同学讲过，毛主席在延安时给《新中华报》题词，两个字：“多思”。多多思考，不要简单化，头脑不要简单化，不要直线，不要想当然，那不符合辩证唯物论，不是毛泽东思想。

关于毕业生的问题，中央现在正在研究，准备方案。毕业同学在未离开学校前，安下心来，搞大批判，搞斗批改，不要当逍遥派。

我今天随便讲这些，不知道对不对，是同大家商量，向大家请教。

（热烈鼓掌）

江青同志讲话

同志们！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本来在武汉事件时就想与同志们见见，听听意见，但后来拖下来了，拖到现在。不管怎样说，我们还是有缺点的，缺点就是：更早的和你们交换意见，现在晚了一些。如学校走的问题，如果早提出，一定会少走一点。清华走了五千，北大也不少。开始走人知道，我们就有责任，不能把责任推到你们身上。当然我们也观察一下问题。如果早一点可以帮助同志们安静下来，形势逼人，工作有时有被动，不能主动，像今天会本来八点开，但到十点才开，伯达同志讲话是准备的，我是没准备和同学们交谈一下。

关于形势问题，应该有个比较，否则没大好形势。到现在形势和去年形势，历史的全面的去看看，是不是大好形势呐？你们会说去年没有这么多武斗，现在武斗形势不好了，其实不然，伯达同志讲了武汉已经解决问题了，基本已经解决了。还要做大量工作。为什么说现在形势比去年大好哪？去年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虽然是一小撮，但还有权，还强硬，还能调度，现在呢？全瘫痪了，这点你们同意不同意。

有人背后操纵，有训练武斗是强还是弱呢？我认为是弱了！每个人都想想，愿意不愿

意武斗？党中央、毛主席从来都坚决反对武斗。这是一种弱的表现。当然有的地方有损失，革命小将和群众受迫害。但是，同志们想一想，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死几个哪有！我不是说死人越多越好，因为敌人是一定要反扑的，他要较量的，如果想的很简单，一年过去了没有事了。我看急不得，两个阶级反复较量，总之一小撮没有办法调动军队，自己本身处于瘫痪，只好在背后操纵挑起武斗。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很难过，有些材料是没有核实的，有些材料是经过核实的，他们没有办法就只好训练少数人进行武斗。我们接到一封信，这个人说是武工队的，他说他杀了四个人，他想逃出来。我看这封信是真实的，他们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挑动农民进城。也是武斗，是强还是弱？农民进城总是要吃喝吧，这是有限度的。今年的一月和去年冬季他们还使用一种手段经济主义，目前在有些地方也有这个东西。所以说形势好就是过去它是比较强有力的，掌握政权，现在瘫痪了，过去有些群众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如江西从“连×”突围出来的一个小将想去南昌，途遇他的对立面全副武装，这个小将受了伤，在一个农民家里，是老大娘照顾了他，农民是爱护小将的，后来他们要农民活埋他，农民没有这样，后来农民老大娘设法把他送到南昌，这说明群众受蒙蔽，如说明白了，进行宣传工作，进行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说贫下中农一定要进城搞武斗对革命小将不爱护，是不正确的，他们是受蒙蔽，但觉醒就不这样做，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宣传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中国革命的意义，和历次革命的意义，从一小撮走资派变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他们的武斗也就不行了。关于形势的问题我个人有这个看法。

今年是比去年大好了，今后会更好，靠大家工作得更好些。你们对形势的分析我觉得是有矛盾的。一方面觉得武汉形势，武斗不好，很危险，另一方面又说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那就是指北方武斗落后。难道北京搞大武斗才先进吗？逻辑上也不通，北京工作有很大成绩，有先进的地方，也有落后的地方。一鼓动就说北京落后那就不对了，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开过两次百万人大会，对全国起很大的作用，这能说北京落后吗？有些看法不一定妥当。这些看法可以讨论，但我希望不要把这思想强加给别人，正如我不把我自己的思

想强加于你们。可以批评，可以睡觉，我学习主席允许我们睡觉。主席讲话不长。当然也有一个好的方面，出于对全国形势的关心，这种心理不可排除，这是一种关心。

革命的大联合问题。我还是想强调，你们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好呢？还是搞分裂好呢？分裂是正常现象，但是为了革命，为了战胜敌人，要在革命的大前提下面，要一致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共同斗争，我看还是搞大联合好！有什么小团体主义、个人的私心杂念不能排除呢？在座的革命小将很多都经过了一年多的斗争经历了，难道这个问题不能逐渐解决吗？而是讲起来津津有味，令我吃惊的是，揪刘火线，开始比较统一，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打架，我就想不通，既然是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为什么就不能联合呢？你们没有小团体主义？没有风头主义？你们的请帖，去年给我们的是手写的，是在一张小纸上写的，现在越来越高级，请帖好得很那！你们在火线上不联合，遇到真正的敌人怎么办？还打内战？

个别单位搞自己的展览。最近我很难过，我看到你们把我吹得太厉害了，就要跌倒了。在这儿（指长安街上）有一幅画：把我也画上了，我看了以后很不安，很难过。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做了一些事是应当的，况且有时还作错误呢？最近好了，把画盖上了，我就舒服了。现在我感到有些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有些造反派单位也搞起来了，照了相挂起来，还有电影，还演戏来了，有没有？这是一种腐蚀，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增加一点免疫力，抵抗力。头脑中老想我在那儿出个名，考虑自己，而不是为了革命，团结广大人民。不是考虑大联合，这能不能革命，能不能战胜敌人呢？所以要强调大联合，不要革别人的命舒服，革自己的命就难了。

不搞大联合就不能形成大批判的新高潮。革命的大联合很必要，革命的三结合，而且组成领导班子，才能领导本单位的斗批改。也许有些同志说，这是老生常谈，我们比你们懂得多呢！可是我觉得有必要再说一下。

大批判要在全中国范围里搞，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批倒批透。要在全中国各个方面进行，就要同本单位的结合起来。你们就要坐下来，不要忙忙碌碌地往外跑。

大批判和本单位斗批改的问题，这是百年大计，这是你们的事情，我们不能包办代替，不能替你们干，不能替你们批，不能替你们改。如果把革命的对象确定下来了，就能去团结更多的人。还有利用敌人的矛盾，搞好本单位的大批判和斗批改，走出一条路来。你们就喜欢往外跑，坐不下来。外边也有造反派么！

我听说北大有一两千人在外头，全国全省都有，搞情报，手伸得太长了，你们撤回来了吗？

七月二十二日，我讲了几分钟话，只一页纸，可就各取所需了，抽调了阶级内容就歪曲了我的讲话，爱莫能助，鞭长莫及，有些地方小将受迫害，我想了很久。那时，河南二七公社受压制，他们提出文攻武卫，我讲了，还讲错了一个字，说成“文攻武守”，在这一页多纸里主要强调了文攻，搞政治攻势，使广大群众识破一小撮人的阴谋，搞武斗总是有人操纵的，你们想一想，要是我搞武斗谁给我柳条帽，我也找不到长矛，他们有没有呀？

南京有几万人武斗，最近形势有改变。

北京要带头反对武斗，中央所在地，毛主席所在地么！要带头反对武斗。（谢：不要带头武斗。）但是有些地方，有少数坏人在操纵，例如武汉、河南、南昌，当权派组织一伙人，叫做武工队、红武军，多了，专打要害部门，武器高级得很，比抗日战争还高级，矛头是钢的，很厉害。使广大群众识破一小撮人破坏我们，使他们孤立起来，就是要提高人们的认识。在有的地方，一个条件群众受蒙蔽，第二个条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有力量，革命派出于劣势，赤手空拳。有的地方，我看了心里很难受，小孩也被捅了。像河南二七公社，提出“文攻武卫”，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而你们是不是像河南二七公社呢？有的还提出“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文的怎么卫呢？

听说，有的地方，两派都在准备砖头，准备武斗，还说是我允许的。这是歪曲。我说的不仅是指河南，也是指武汉，武汉廿日凌晨，扣押了谢富治等同志，在那种情况下，我要支持革命派，那里革命派又没有武器，对立面拿着武器，背后又有人指使，在那种情况下不让革命小将自卫呀！可是你们，有的地方还修工事，我觉得儿戏了，要冷静，头脑冷

静很重要，不冷静容易犯错误，要冷静、勇敢、谨慎。

刚才伯达同志讲了，有个秘密组织“5.16”，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允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浑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的人想从两个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尽管工作中可能有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像“5.16”这样的组织是不容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还有一种被广泛流传的传单，署名就很怪，藏龙，藏貉，伏虎。有什么十条的，十二条的，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无产阶级革命派，传单的标题是“请看革造总部的‘绝密’策略”（假工代会搞的）。他们七月末八月初在北海公园、景山公园、王府井大街公开张贴，很像是特务干的，可能与“5.16”有联系。这是一种破坏行为，要向群众讲清楚（谢副总理插话：与“5.16”有联系）。

有些地方把我们小组分成多少个派，这是不对的。在一些地方看法不同，这是常事，你们也一样。但是，我们是团结在毛主席周围。有人说我与伯达同志，还有戚本禹同志是一派，王力与康老是一派，根据什么呢？

对于聂元梓同志，我没有私交，过去不知道这个人，去年写了大字报后，才知道这个同志。对于她的对的，我们全组都支持，她的错误，我们是不支持的。对于在座的同志也是这样的，对的就支持，错的向你们提出意见，交换意见，你们也可以驳，但是不允许闹分裂。人大三红的分析我觉得有些道理，我也怀疑有一只黑手，不知我讲的有没有道理。这只黑手不仅伸到群众当中，伸到革命小将身边，还想在我们身上打主意。肯定要失败！对于革命小将，他也是要失败的。因为革命小将也在提高嘛！

要满怀信心，主席在搞斗争时，想到，充分想到困难的一面，但是，总是满怀信心地领导中国革命。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如果不对形势作正确的分析，把自己放到恰当的位置上，那就会出问题。我们应当领会主席的思想。你们不仅是闯将，而且应当是有勇有谋，智勇双全。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要

提起脚就走。现在北航你们还搞斗批改吗？总是要有点试验嘛！失败了再改，这不妨碍我们搞大批判，这个工作很艰苦。

今天话讲长了，你们也听腻了，结束吧。

康生同志讲话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的讲话。因此，我没有多少话可讲。谈到形势问题，伯达、江青同志具体说明了这个问题。当前形势不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复辟的前夜，而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所讲的大好形势。江青同志具体讲了，从比较方面讲了，我补充一个具体事例。

今年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接着五·一七《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题目叫做《伟大的历史文件》。这就是说“五·一六”通知是伟大的历史文件。我想同志们看形势不能离开“五·一六”通知和“五·一七”社论。这不仅是毛主席批发的，看过的，而且很多段落是主席亲自写的。同志们不但要看中国的形势，而且要看国际形势。你们从这篇社论看看到底讲了什么？社论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有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最后一个里程碑就是我们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社论讲，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解决。列宁提出了这个问题，如在《叛徒考茨基》、《“左派”的幼稚病》中讲到被打败的资产阶级时时企图复辟，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但他后来没来得及、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以前，承认苏联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但二八年以后，一九三六年就否认了，直到将要去的前两年，又觉悟了这个问题。他的缺点是没把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始终看成是有阶级、阶级斗争的。毛主席不但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加以论述，并实际解决了这个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的阶段。这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不仅是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使国家不变

颜色的问题。而且对世界有伟大意义。所以得到世界人民的拥护。通知最后，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是长期的，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解决问题了。同志们可以看一看、想一想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无论是对共产主义发展的历史方面，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各方面，无论是在社会主义进行阶级斗争方面，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巨大的贡献。我们在这个文献中记录下来了。难道同志们不能从这些文件中看出现在世界的大好形势吗？

我们个别同学不认识重新发表“五·一六”通知、“五·一七”文章的意义，反而以资产阶级思想去推测，认为又要抓一小撮。“五·一六”通知为什么重新发表？本来已经回答了证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证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但有的同志看不到，这样分析，那样分析，这样推测，那样推测，根本的问题是没有掌握毛泽东思想。甚至别有用心的人组织什么组织，取名“五·一六”，应该说他不配叫“五·一六”，是污蔑“五·一六”。

顺便讲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在最幸福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亿万群众，使亿万群众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史无前例的大事情。前天有一个英国左派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污蔑我们的文化大革命，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他同中国机床二厂的一个工人谈了一下，认为中国通过文化大革命，工人觉悟水平的提高是他想不到的。他是英国共产党中长期做工会工作的。我回答：是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恰恰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直接武装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是史无前例的事。污蔑我们文化大革命的人是毫无常识的。他们是不愿意直接把马列主义交给群众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成绩。

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应该检讨，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够。同志们应该多想想，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学了多少毛泽东思想，领会了多少，活学活用了多少。要常常想想，包括我们在内，希望我们一道多想想，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时局。要少打内战，不要提起两脚到处串，不要觉得自己已经百分之百了，没有那回事。用毛泽东思想量量，一天一

地。如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话，就不到处乱跑了。我这样说有什么证据？我就拿“五·一七”文章大家不注意为例。

最后一点，是我经常讲的，同志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必须有敌情观念。我们面前有帝国主义、苏修、有蒋介石。江青同志讲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使敌人胆战心惊，他不会不利用我们的缺点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他们会利用无政府主义，进行各种阴谋活动的。昨天香港造英国反的群众给我寄来一本东西，跟毛主席语录一样，是刘少奇语录；我们是毛主席像，它是刘少奇像；我们是林副主席题词，它是刘少奇题词；我们是毛主席语录三十三节，它是刘少奇语录三十三节。这是什么人干的，我知道，是美国特务干的。这说明敌人没有睡觉，不但我国内部有走资派，国外还有帝修反。这不证明他们有力量，而是证明他们穷极无聊，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挽救他们灭亡的命运了。他们的命是挽救不了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胜利，同志们要进一步努力。

周总理的讲话：

同志们，战友们！

我完全同意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和江青同志所讲的话。我只想补充两个问题，一是形势，一是军队。

关于形势，从客观发展分析，伯达同志已经指出，摆在面前的有两种估计。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红旗》都说形势大好。为什么这么说呢？江青同志说要比较地看。还要看敌人怎么说我们。

去年，你们到全国去，起了点火作用，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称赞的。第二阶段夺党内走资派的权，从上海开始，马上席卷全国。上海、黑龙江、山东等几个地方的经验证明，这里头道路只有一条，打击一小撮，解放一大片，三结合，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已经夺权的也有经验要补充。文化大革命没有前例可沿，靠我们实践，总结经验。道路是曲

折的，不能直线上升。小将们，不但你们参加文化大革命，康老讲了，你们还要教育下一代也要搞文化大革命。

我们在前进中有个缺点，去年党内、政府内的两条路线斗争非常尖锐，即使承认了错误，还是不能改变领导，还是压制革命派。毛主席把“三支”、“两军”的任务放在解放军身上，这个任务很艰巨，但这半年证明他们是胜任的。虽然出了赵永夫、王良太、陈再道，是少数人，广大解放军是最可信任、最可依靠的，没有这样一支工农子弟的武装力量行吗？我们周围都是敌人么！我们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蓬蓬勃勃的，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思想，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还有广大群众，但解放军起了很大作用。

解放军是最听话的。青海的情况一摆清楚，赵永夫就是一个独夫了。领导一改变，形势马上改变了。内蒙打了一枪，我们发现了，广大部队经过教育马上转变了。武汉问题，谢富治同志所以能光荣地胜利地回来，当然主要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喽，解放军也出了力，我在，我知道。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最多一次三百万，就是解放军维持秩序。毛主席看到后几次秩序好，就提出搞军训。在短短时间里，一千多万人接受检阅，外国人想不到，没有解放军行嘛？当然也有些损失啰。北京今年武斗，解放军去隔开。我们经常向郑维山他们表示对军队的敬意。这支武装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很好的军队，我们很激动的。密云那边那么多受伤的，全国更多，还有个别被打死的。受伤的以千、万计，领章撕了，帽徽也扯了，还是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正做到了不动气，当然也有人动气了，不还手，不开枪，百分之九十九，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做到了，没有毛泽东思想武装，光是物质武装，能做到吗？

这样的军队，出了几个坏人，有什么了不起。陈再道常败将军，不是常胜将军。他领导的独立师一个士兵要用枪打王力，一个营长就站出来堵住枪口，不让打王力，士兵一看营长这样，就没打，有思想啊，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鼓掌）这不是一天一日训练成的，是几十年培养成的。毛主席提出三相信，三依靠，最重要的环节是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军队错了改得也快，山东司令员一想通就改，痛痛快快，不像走资派那样。谭启龙、

江渭清也是解放军，但变了质了，干地方工作干久了，变了质啦。

“五·一六”通知的发表，证明我们所取得的成绩，证明了伟大领袖的预见。通知最后一段说，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这是毛主席写的，当时主席已有思想考虑了。只有毛主席领导才能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苏修搞接见记者，有什么用，不过多了几条消息，几个电视镜头。香港搞什么刘少奇语录，什么“五·一六”行动，“七·二〇”事件，都说明他们虚弱。

最近在广东九龙边境，这是临时性的边境，工人冲过去了。工人读毛主席语录，贴标语，他干涉，我工人冲过去了。警察署警察想开枪，我工人一把把枪抓过来，对着警察，十几个警察乖乖地交了枪。别地方的警察要来，工人用枪对着警察署长，来就先打死你。署长马上下令不让来。以后达成三条：铁丝网去掉，允许对着那边贴标语，允许带毛主席语录通过。工人把夺来的枪放在地上，就胜利地回来了。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工人，藐视帝国主义。

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有另外一种看法，说全国处于反革命复辟的前夜。刘、邓、陶有那么大作用啊？这是香港报纸说的，是敌人说的，是不是小将看参考消息受了影响。说什么有反革命复辟的危险，会出现更多的武装叛乱，要武装解决问题，武装夺取政权，夺军队的权。我们小组讨论，为什么对形势的看法和我们这么相反。有人说，在北京不能夺谢富治同志的权，不能夺卫戍区的权，也不能夺军委的权，就到外地去吧。为什么把人民解放军看得那么轻，把刘、邓势力看得那么大？事实完全相反么！“百万雄师”也只是少数头头干坏事么！独立师只做了半天政治工作，四个团就全部调出武汉三镇。那么听话。你们没感想吗？把王力救出来也是解放军。这是毛主席思想教育的结果，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崇高威信。

不错，我们不否认，军队里有些保守思想，与刘邓陶有某些共同处，但不一样。即使对武汉也要一分为二，好的是多数，不好的是少数。不能说武汉出了陈再道，就到处抓陈再道。有人说广州军区好些，但也有人提出要抓广州的黄再道。以前抓了谭震林，就到处

抓谭式人物，现在陈再道又行时了。军队犯错误与刘邓不一样。刘邓路线地方执行得多，改得很慢。军队不同，“三支”、“两军”任务很重，没有经验，近十多年群众工作比较少。去年河北地震，解放军去了，所有村子都宣传到了，受那么大的损害，群众的精神面貌、生产面貌很好，去年丰收了，今年又丰收了。这支军队，交给他什么任务，就完成什么任务。军队也有军队的传统，服从命令，也受了一些黑《修养》的影响，但一说就听，尤其是野战军，我们就是要相信他们。现在不少地方的保守派，甚至有些坏人，夺解放军的枪，抢物质，抓解放军的人，这是错误的，现在面临着对解放军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这个问题应当提出来。不能像去年抓走资派那样搞，不然要犯错误。还没有到那个地方去，只接了一个电话，就贴出标语，什么广州的黄再道。这不好，战士看到会很难过么！人家有战功么！他们有错误就改嘛！小将帮助他们嘛！不能武装夺取政权，夺谁的权啊？像陈再道那样搞叛乱，我们才夺他的权，陈再道叛乱才不到一天嘛。刘丰保护王力，在整个武汉事件中，出了很大的力，所以当武汉军区政委，现在有人又怀疑了，这是不对的，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去的嘛！

现在发生的紧急的事，就是武斗问题，夺枪问题，农民进城问题。农民是不愿进城的，是受了蒙蔽。小将去年当闯将时是立了功的，现在要前进。各地的事，各地革命派可以自己解决，武汉问题武汉可以自己解决嘛！要去，中央组织少数人去。如这次北航一些同志跟谢富治等同志去武汉，是起了好作用的。自由流串不行，武汉去了几万人，对人家是个包袱，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外流首先是对自己不利。有个组织纪律性吧！有红代会嘛！出去也不打招呼。蒯大富说他们出去五千多人，他也控制不住，不仅清华，清华是说了，别的学校也有，统计一下子。

现在最大的要求是，认清形势，安下心来，学习全国的经验，批判刘、邓、陶。天安门大会以后，回本单位搞斗批改。希望大家努力。然后，中央组织一些学校少数人外出作调查。夺枪、冲击军区是不允许的，“六·六”通令说了，要劝阻。要劝阻农民进城，不要妨碍文化大革命，不要妨碍生产。戚本禹同志和我提议，矿业学院到全国煤矿去，现在

煤矿生产上不去，要去抓革命，促生产，要疏通，如同过去铁道学院去疏通铁路一样。北京是红卫兵的发源地。以后，一部分人在校内搞斗批改，一部分人外出作调查。红代会在这个问题上要表现自己的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你们大学生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嘛，比起我们当年知识多，你们的小资产阶级毛病，应该比我们当年少得多，应该比我们高明得多。

大专毕业生的生活问题，很快要发通知。六六年毕业生照过去的待遇，今年的毕业生略低一些。分配的地方愿意要，自己愿意去的，就去。有的地方不能接受，就晚点走，留在学校搞斗批改。抽出去作调查工作的，也享受这个待遇。

总之，希望大家按照毛主席说的，做到三相信三依靠。今年有这样光辉灿烂的形势，相信明年会更好。像伯达同志说的，开花结果。

谢富治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

今天晚上的座谈会是非常重要的会，不要看成是普普通通的会。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戚本禹、姚文元、叶群同志都到会了，王力身体没全好，杨成武同志有一点别的事情，没有到会，三军的领导同志都到了。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四位同志讲了话。

为什么开这个会？因为文化大革命出现新的大好形势，但在北京少数同学中间引起了思想上不那么完全统一看法，需要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同志们，听听大家的意见，把形势任务讲一讲。五十所大学都来了。中学来的少，所以很多人在门口叫喊。中学六百多个，一个学校来两个人，就一千多，座谈会就不好开了，所以主要是大学。工人来了几十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几十人，希望中学同学原谅。

建议大学同志把四位同志的讲话整理一份记录，你们大学生记得快，不要贴大字报，什么好得很啊，那不顶事。要整理一份记录，然后在大学里学习一个礼拜，同时学习中央

的一些指示，《红旗》、《人民日报》有关社论、文章，把当前形势讨论一下。要把四位同志的讲话统一整理，两派一起整理。昨天武汉造反派就是一起整理记录的。不能于自己有利的就拿过来，于自己不利的就不要。

昨天，听了大家的意见，小组的同志批评我，说北京市没抓大批判和大联合，听大家发言后，听不出对刘、邓、陶的大中小批判，也听不出怎么大联合，光是吵架。批评的对，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但制止武斗我是讲了的，我提议上街游行，反对武斗，做得不够，但是做了的。

希望大学、中学、工人同志们搞好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总理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指出的正确航线，我们要沿着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航线前进。我们是沿着这条航线，跟着中央的指示，《红旗》《人民日报》社论走，还是跟着哪个学校动态组的一篇形势分析走呢？我想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就在毛主席、林副主席身边，中央文革的同志经常同大家见面，我们一定要跟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走，不要受任何干扰。

拥军爱民问题。对军队要有正确的看法。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特别是北京部队，直接受到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的关怀。江青同志在四月廿日提出了拥军爱民的口号。这不是一年一次的那个口号。三相信、三依靠，人民解放军这个因素是很重要的，刚才总理讲得很清楚了。

不要出去串联了，出去的找回来。大批判、大联合没有抓紧我负责，责任在我身上，但希望同志们支持一下。■

（资料来源：“毛主席的新北大” 新北大公社 火车头编辑部 1967.11）

【编读往来】

1. 叶宁、顾勉之谈常风之文

常风先生把批判邓小平列为孙蓬一的罪责之首。让我想起了一篇关于清华蒯大富的网文：“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蒯大富案。在被告席上，蒯大富这样问审判长：“您比我大10岁，1966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么？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么？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反革命？”

我想用同类的问题请教常风先生：文革之初，阁下认同“打倒刘邓”这类提法吗？文革后期，阁下认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类运动吗？进言之，你常风先生响应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听从毛主席的教导了吗？

如果常风先生回答否，那么，他在当时就是现行反革命。如果他回答是，那么，我要问，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去指责孙蓬一呢？是的，孙蓬一犯过好多错误，有好多性格上的缺点。但是，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与常风先生平起平坐。■

南京 叶宁

读143期的《记忆》，看常风主张“客观、公正”的文章。事实上，他既不客观，也不公正。比如，他把哲学系沈迺璋之死，说成是聂元梓、孙蓬一的责任。沈教授是1966年10月6日自杀的，那个时候，北大并不由聂、孙主事。即便他们想负这个责任，也负不了。按照常风的逻辑，凡是发生在北大的事都应该由聂、孙负责。这就是他主张的“客观公正”么？写这种文章的人，要么是不了解北大的文革，要么是被闹派性遮蔽了双眼。

令人遗憾的是，《记忆》居然让这种违背基本史实的文章招摇过市。贵刊的编辑不会是九零后吗？你们难道不知道打倒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文革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举国上下欢呼拥护的吗？■

洛杉矶 顾勉之

2. 张晓良的感想

先读 146 期，为何？我也曾是知青！当然，比不上“老三届”，77 年高中毕业后下放。2006 年我儿子高考，分数出来后我写了几句话：想当年我十八，下放通知送到家，铺盖一卷担在肩，一颗红心两脚泥巴，广阔天地把根扎。儿子今年也十八，寒窗十二载，铁树终开花，高考成绩网上查，预计能把一本大学校门跨。罢，罢，罢，人生能有几十八，儿子正青春，我已生华发，父子再订新规划，相约不负好年华。 ■

3. 何蜀指出 146 期重发齐人一文

知青专辑那篇祭沈因立，原曾由朋友推荐给我，在 2013 年的《昨天》20 期上发过，而且选入了 2013 年的《昨天》精选书中。此文最先发我时没有署作者名字。问推荐者，才得知是另一已故知青写的，推荐者叫我把文章署名为“齐人”，说作者本人是旗人。■

《记忆》回复：《祭沈因立》一文的重复发表是严重的编辑事故。感谢何蜀、张晓良等朋友的提醒。今后本刊将杜绝此类事情发生。■

4. 郑建国谈任国庆的知青一文

在我看到的谈上山下乡的文章中，任国庆是较清醒的。这或许是因为他在异国他乡的缘故。如果在国内，他恐怕也会跟别的学者一样，要么是被主流洗了脑，要么是脑袋别在主流的裤腰带上，跟着人家跑。国家给上山下乡运动立项，也应该像香港知青给逃港者立碑那样，在大陆给上山下乡运动立个纪念碑。■

上海 郑建国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记忆》的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